

本文章已註冊DOI數位物件識別碼

▶ 北韓與古巴政治體制與轉型之比較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of North Korea and Cuba

doi:10.30390/ISC.201503_54(1).0001

問題與研究, 54(1), 2015

Issues & Studies, 54(1), 2015

作者/Author：王佳煌(Chia-Huang Wang)

頁數/Page：1-33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2015/03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503_54\(1\).0001](http://dx.doi.org/10.30390/ISC.201503_54(1).0001)



DOI Enhanced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http://doi.airiti.com>

請往下捲動至下一頁，開始閱讀本篇文獻

PLEASE SCROLL DOWN FOR ARTICLE



北韓與古巴政治體制與轉型之比較研究*

王 佳 煌

(元智大學社會暨政策科學學系教授)

摘 要

為什麼北韓與古巴的統治者可以經歷二十世紀末期的民主化與所謂「第三波民主」(Third Wave Democracy)的浪潮，化解內外壓力，屹立不搖？北韓與古巴的統治體系與制度運作有何特質，讓這兩國的統治者可以牢牢地鞏固政權，而且延續家族的統治？北韓與古巴未來的政治轉型有哪些變數或面向值得注意？為探討這些問題，本文檢視若干政體分類的要點與問題，以及「顏色革命」、「茉莉花革命」的論述，採用文獻探討與訪談法，比較北韓與古巴的政治領袖與領導階層、黨國體系、意識形態、集體動員與市民社會等面向的異同，檢視各種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等非民主國家政治體制分類的描述力與解釋力，推斷北韓與古巴民主轉型的可能性。

關鍵詞：政治轉型、黨國體系、主體哲學、金正恩、卡斯楚

* * *

壹、導 言

前蘇聯與東歐共產黨國家垮台，經歷政治與經濟轉型，中國大陸推動漸進的改革開放，幾經保守派與改革派的鬥爭與波折，雖仍在中國共產黨的掌控之下，但冷戰時期的嚴峻情勢已成過去，隨之而來的是後冷戰的多元對立與多元結盟、區域性衝突（如主權之爭）與非傳統戰爭（如反恐戰爭）。所謂的社會主義國家集團大部分皆已轉型，只剩下中國、越南、北韓與古巴。但前兩者已著手推動經濟改革，採取市場社會主義的路線，發展出混合的經濟體系，只是在政治上仍嚴密控制人民與社會。北韓與古巴不但沒有經歷類似「蘇東波」的政治轉型過程，也沒有大幅度的經濟改革，統治者仍然嚴密監控人民，強力壓制內部的異議聲音，或是國家機器吞噬整個社會（尤其是北韓）。在區域地緣政治與全球戰略形勢之中，北韓與古巴仍然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 本文為國科會（現升格為科技部）補助研究計畫「後極權主義政治經濟轉型之研究：以中國、俄羅斯、古巴、北韓為例」之部分研究成果，計畫編號 NSC99-2410-H-155-03 -MY2。感謝國科會的補助，也感謝本文審稿人的指教，讓本文品質能更好。

色，令美國及其周邊國家頭痛不已；前者運用邊緣戰略 (brinkmanship)，在中國、美國、日本、南韓之間合縱連橫，鞏固掌權者的統治，要索經濟與人道援助，後者則是透過左派的國際政治結盟與醫療技術援助，團結部分拉丁美洲國家，始終是美國的眼中釘、肉中刺。^①

21世紀初期，喬治亞、吉爾吉斯、烏克蘭等國掀起「顏色革命」(Color Revolution)，埃及、利比亞、突尼西亞等國經歷「茉莉花革命」(Jasmine Revolution)或「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選舉舞弊、貪腐殘暴的統治者或獨裁者(包括其家族親友)，如穆巴拉克、格達費等遭到推翻，病死或死於非命。相對地，北韓與古巴的統治者不是在老病死亡之前做好人事布局，就是預先退位，安排政治繼承。北韓與古巴的政治繼承不無挑戰與變數，但政治體制似乎沒有劇烈或大幅的變動，民主化或漸進改革的前景似乎遙遙無期。

爲什麼北韓與古巴的統治者可以經歷所謂「第三波民主化」(Third Wave Democratization)的浪潮，化解內外要求改變的壓力，鞏固其政權？隨著這個問題意識，我們或許可以探討一連串研究問題：北韓與古巴的政治制度、統治機制、社會結構、歷史文化有何特質，足以讓統治者牢牢鞏固政權？爲何北韓與古巴近年相繼完成的權力接班，都是延續家族統治？這種政治繼承模式能否持續下去，長期維續其政權？未來可能有哪些變數與可能的變化？哪些概念面向可以協助我們描述、解釋北韓與古巴非民主體制的特質與機制？

針對這些問題，筆者不打算建構宏大的類型學或分類體系，而是比較北韓與古巴這兩個比較相近或類似的個案，聚焦於若干重要面向，找出其體系異同與異同之原因、脈絡，回頭檢視各種極權主義與後極權主義的類型學，討論這個國家民主轉型的可能性。本文探討的面向包括政治菁英與領導階層、黨國體系、意識形態，以及國家機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

透過本文的描述與分析，筆者希望可以在國內的比較政治中有所獻替。國內外研究北韓與古巴如何操作地緣政治與戰略的論著所在多有，國內從國際政治與戰略、外交的層面切入，研究北韓與古巴政治情勢的專家學者不乏其人，報章雜誌上對北韓爲什麼要挑釁，下一步可能會做什麼，以及北韓軍事力的專業評論俯拾皆是(古巴的部分較少)，但北韓與古巴的政權特質、面向與內涵，國內的研究論著(專書、專書論文與期刊論文)較爲少見，比較多的是政局分析。有鑒於此，本文期望能在這一方面，

註① 參閱 Katherine Gordy and Jee Sun E. Lee, "Rogue Specters: Cuba and North Korea at the Limits of US Hegemony," *Alternatives*, No. 34 (July-September 2009), pp. 229-248。不過，美國與古巴的關係並非完全沒有改善的時刻與可能性。在冷戰時期，美國與古巴之間的關係自然劍拔弩張，1970年代曾有緩和的努力，但美國後來還是維持強硬態度。後冷戰時期，兩國之間的關係並未立即改善，小布希政府對古巴的經濟制裁與禁運措施並未就此解除，甚至因爲劫機劫船事件、委內瑞拉查維茲(Hugo Chávez)與古巴結盟反美而再度惡化。歐巴馬政府曾放鬆部分貿易制裁，但隨即因爲美國反古巴議員與遊說團體的壓力，延長經濟制裁。古巴則是在蘇聯垮台之後，多邊結盟以對抗美國。參閱：柯玉枝，「美國與古巴關係之限制與前景」，陳小雀主編，*拉丁美洲與世界關係*(臺北市：世理雜誌，2011年)，頁112-124。

嘗試拾遺補闕，以為繼續研究之參考。

本文的研究方法以文獻閱讀與整理為主，訪談法為輔。筆者閱讀整理的文獻包括學術論著與新聞報導。訪談法則是由筆者與助理訪問淡江大學美洲研究所所長陳小雀教授，將訪談內容打成逐字稿，做為筆者閱讀文獻與撰寫文章的參考。^②

這裡必須說明，筆者受到語言能力的限制，僅能閱讀中英文研究論著與新聞報導，無法直接閱讀韓文與西班牙文相關論著，這是本文的局限之一。其次，受到研究計畫經費的限制，筆者也無法親自到北韓與古巴搜集資料與訪談。再者，有關北韓與古巴的資訊相當封閉，因此筆者只能倚賴新聞報導與學者依據二手資料所提的論述。不過，這個限制可能也是許多想研究北韓與古巴的學者專家不易解決的困難。

本文分為七節。第一節是導論，說明研究動機、目的、研究問題及研究方法。第二節論述威權主義、極權主義、混合政體（hybrid regimes）與轉型理論，比較其描述力與解釋力。本節的論述，顯示既有的類型研究，均難以直接用於古巴、北韓及其他非民主國家的政治體制，因此主張聚焦於主要的面向，以供未來更完整的比較研究參考之用。第三節至第六節分別論述北韓與古巴的政治體制。第三節描述北韓與古巴政治菁英與領導階層的組成與變動。第四節描述北韓與古巴黨國體系，對照出兩國體系特質的異同。第五節勾勒北韓與古巴的意識形態內涵，說明這兩個國家如何建構其意識形態，以及兩國意識形態的差異。第六節論述北韓與古巴的集體動員模式，國家機關與社會之間的關係，以及市民社會（civil society）形成的可能性。第七節結論綜合比較北韓與古巴政治體制的異同。

貳、威權主義、極權主義、混合政體與政治轉型理論

對於二次大戰後的非民主國家，尤其是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國家，比較政治學者提出各自的理論框架或類型學。Geddes 將威權政權（authoritarian regimes）分為個人統治（personalist）、軍事威權（military）、一黨威權（single party），以及前述各種威權的混合型（amalgam）。^③此一類型學與實證資料的分析雖然有其描述力與解釋力，卻難以解釋許多非民主國家為何仍能鞏固其家族政權或極權體制，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北韓與古巴。北韓長期的經濟凋敝尚未造成政權垮台，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與經濟成長不一定促成民主化。Geddes 並未明確界定何謂個人威權，未區分真正的一黨專政威權、一黨支配的威權（dominant party regimes，容許反對黨存在）與有限多黨體制（limited multiparty regimes）。威權也不一定會轉向民主化，經常是從一種威權轉為另一種威權（如競爭型威權或選舉造就的專制統治 elected autocracy）。^④

註② 筆者與助理於 2012 年 2 月 29 日至淡江大學研究所訪談陳所長。

註③ Barbara Geddes,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No. 1 (June 1999), pp. 121-123.

註④ Alex Hadenius and Jan Teorell, "Pathways from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8, No. 1 (January 2007), pp. 145-148.

另一種類型學研究將非民主國家或政權分為君主、一黨、無黨、軍事、支配性有限多黨 (dominant limited multiparty)、非支配性有限多黨 (nondominant limited party)、民主多黨 (democratic multiparty)，以及前述各種類型的混合，再加上一些小類型 (暫時的、中央無力控制地方的)，分析 1997~2003 的非民主政權演化，發現 77% 的威權轉變為另一種威權，君主統治最難轉型為民主政體，多黨制是威權政體民主化的前提等。^⑤這種分析雖比 Geddes 的研究更精緻，也納入新的變項與新的政治情勢，但仍無法處理中國、北韓與古巴等國家的政治體制與政治轉型問題。

Linz and Stepan 依據多元主義、意識形態、領導與動員等四大向度的表現，區分民主政體、威權政體、極權政體、蘇丹主義 (Sultanism, 極端的家父長制 patrimonialism 或獨裁君主制)，並提出後極權主義的理念類型及其子類型，如初期後極權政體 (early post-totalitarianism, 黨的合法性仍強，市民社會仍弱，領導階層仍可壓制修正主義與反對者)、凍結的或癱瘓的後極權政體 (frozen post-totalitarianism, 停滯不前，看不出民主轉型的前景與可能)、成熟的後極權政體 (mature post-totalitarianism, 有可能轉型為民主) 等。^⑥如表 1 所示，威權主義、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蘇丹主義，在市民社會的自主、政治社會的自主、憲政主義與法治、國家官僚的專業規範與自主、經濟社會 (市場自主與多種所有制) 等面向，各有其程度差異。但這裡必須強調，這些特質是理念類型的說明，目的在幫助我們論述與研究，並不表示各類型非民主政權的特質高低或強弱必定是照表一所呈現的方式排列，也不表示這些非民主國家的特質彼此不會有交錯出現的狀況，更不表示威權主義與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多元主義民主之間是一種連續體，有必然的演化方向，或必然轉型為西方式或美式民主。

表 1 非民主政權類型與民主鞏固之意涵

面向特質	威權主義	極權主義	後極權主義	蘇丹主義
市民社會的自主	中到高	低	低到中	低到中
政治社會的自主	低到中	低	低	低
憲政主義與法治	低到高	低	中	低
國家官僚的專業規範與自主	低到高	低	低到中	低
經濟社會 (市場自主與多種所有制)	中到高	低 (共產主義) 或中 (法西斯主義)	低到低中	低到中

資料來源：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 56.

註⑤ Ibid., pp. 148~154.

註⑥ Juan J. Linz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0~54, 55~56.

Thompson 從此一類型出發，加上混種後極權政體 (hybrid post-totalitarianism) 的類型，聚焦於政黨合法性、領袖行爲、社會的現代化 (societal modernization)、反對者的策略，試圖勾勒後極權體制政治轉型的各種類型與路徑。在冷戰後期，極權主義國家集團的內部即已產生分化。匈牙利、捷克斯拉夫等東歐國家於 1950 與 1960 年代出現後極權主義轉型的跡象，但很快就遭到各國共產黨政府與蘇聯的壓制。從 1970 年代後期到 1980 年代初期，部分東歐國家與中國已進入初期後極權主義階段，戈巴契夫 (Mikhail Sergeevich Gorbachev) 統治的蘇聯也難以抵抗此一大轉型的浪潮。1980 年代末期「蘇東波」之後，蘇聯與東歐共黨政權紛紛瓦解，中國經歷「六四事件」，在政治上成功地化解大規模民主化的壓力。^⑦隨著鄧小平重啓改革、俄羅斯聯邦的成立 (尤其是戈巴契夫的垮台與葉爾欽 Boris Nikolayevich Yeltsin 掌權)，以及東歐國家的民主化、政黨輪替，所謂的後極權主義國家已分化出各種演化路徑與子類型。此外，Thompson 也採用 Linz and Stepan 的分法，區分出北韓與古巴等獨裁君主制。

後極權主義的概念架構試圖將二次大戰後極權主義國家的類型與演化路徑含括在內，但有些比較政治學者並不同意這種分類方式，有些則有自己偏好的分類。例如，有的學者將戈巴契夫之後的俄羅斯，或葉爾欽與普欽統治之下的俄羅斯聯邦歸類為競爭性威權體制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⑧中共、北韓與古巴仍為一黨專政的黨國體系，嚴密控制政治權利 (言論自由、集會結社、選舉、罷免、公投等) 的行使。中共雖推動經濟改革，發展出政治菁英的民主推薦制，但政治鬥爭、派系鬥爭、路線鬥爭仍然非常激烈 (如薄熙來案)。北韓與古巴的轉變較小，看不出太明顯的改革與轉型跡象。卡斯楚 (Fidel Alejandro Castro Ruz) 年事已高 (1926 年生，2014 年已 88 歲)，由其弟勞爾 (Raúl Modesto Castro Ruz) 承繼大權，但勞爾亦已 83 歲 (1931 年生)。金正日死亡，其子金正恩 (1982、1983 或 1984 年出生) 繼位，延續金氏王朝的統治。前者猶如「兄終弟及」，後者則是父死子繼。但古巴經濟改革的腳步與開放的幅度比北韓明顯，北韓的經濟仍陷困頓，經濟改革只有象徵性的政策 (如開城工業園區)，金氏政權對黨國體系與社會的控制力道並無減弱的跡象與趨勢。這兩者均仍保有許多極權主義的特質，歸類為混種與凍結 (frozen) 的後極權主義，或許有某種理念類型 (ideal type) 或啓發研究 (heuristic research) 的意義，但許多學者也不贊同這種後極權主義的類型學或分析框架。

除了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威權主義等類型學的分析之外，前蘇聯時期共和國的「顏色革命」與「茉莉花革命」，在比較政治與 (民主) 轉型理論的研究中也掀起過

註⑦ Mark R. Thompson, "To Shoot or Not to Shoot: Post-Totalitarianism in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4, No. 1 (2001), pp. 63-83; Mark R. Thompson, "Totalitarian and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in Transitions and Non-Transitions from Communism,"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Vol. 3, No. 1 (Summer 2002), pp. 79-106.

註⑧ 參閱 Steven Levitsky and Lucan A.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2 (April 2002), pp. 52-53, 55-58; 許菁芸、郭武平，「俄羅斯聯邦『競爭性威權』體制下之公民社會『管理』與民主走向」，*政治科學論叢*，第 55 期 (2013 年 3 月)，頁 33-84。

熱烈的討論與辯論。吳玉山指出，「顏色革命」（如喬治亞、烏克蘭、吉爾吉斯）看似民主化，其實有其局限。一是他們都屬於競爭性威權的民主鞏固問題，並非真正翻天覆地的革命；二是新的執政菁英多源自舊政權的改革派，並非真正的革命者；三是「顏色革命」建立的新體制與理想的民主體制仍有相當的距離。^⑨有的學者則主張放掉民主轉型理論或模式的預設與命題，因為資料與研究顯示，許多開發中國家（拉丁美洲、非洲與東南亞國家）與後共國家的政治變遷，並未照轉型學（transitology）、「第三波民主」理論所說的民主化階段發展，而是處於「灰色地帶」（gray zones）：脫離過去的極權主義、威權主義，但也不能算是真正的自由民主；這些國家大多數不是轉變為無效率的多元主義（feckless pluralism），就是轉變為支配的權力體系（dominant-power system）。這些國家多數並未單向往民主化發展，並未依循開放、突破、鞏固的三階段過程，並未因選舉而促成民主化，國家機關的建構（state-building）不夠完整。重要的不是問這些國家什麼時候才能徹底地民主化，而是問他們的政治過程、政治模式如何演變、如何形成。^⑩有的學者統計各種極權與威權主義國家的轉型過程與結果，提出「混合政體」的概念與六種政體分類：自由民主、選舉的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不確定政體（ambiguous regime）、競爭型威權（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 regime）、霸權選舉型威權（hegemonic electoral authoritarian regime，如新加坡）、政治封閉的威權（politically closed authoritarian regime，如中國、北韓與古巴）。「第三波民主」的多數結果是轉型為有選舉的威權、偽民主（pseudodemocracy）、非自由的民主（illiberal democracies）。這種分類不能說是完美，但重要的是凸顯自由民主與威權（及極權）之間的灰色類別及其特質之結合，才不會落入民主轉型決定論的陷阱。^⑪

有鑒於各方學者各持己見，難有共識，加上北韓、古巴各有其獨特的歷史脈絡、統治體系，筆者不打算建構新的類型學或概念架構，而是想要綜合各家學者的政體類型學，尤其是極權主義與威權主義強調的特質，聚焦於政治菁英與領導階層、黨國體系、意識形態，以及國家機關與社會的關係，比較北韓與古巴的異同，探討他們如何能夠抵擋「第三波民主」與「顏色革命」的浪潮與壓力，鞏固家族與黨國菁英的統治，再與現有的類型學凸顯的特質或面向對照，檢視其描述力與解釋力。

參、政治菁英與領導階層

一、北韓的政治菁英與領導階層

自 1960 年代中期起，金日成即指定金正日為政治繼承人，並安排各種職務，加強

註⑨ 吳玉山，「顏色革命的許諾與局限」，臺灣民主季刊，第4卷第2期（2007年6月），頁67~112。

註⑩ Thomas Carother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1 (January 2002), pp. 5~20.

註⑪ Larry Diamond,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2 (April 2002), pp. 23~29.

培養與歷練。1994年，金日成死亡，金正日順理成章繼承大位。金正日的權位鞏固主要是靠三大勢力，一是金氏家族與親戚構成的族閥，二是穿透於軍隊之中的「三大革命小組」（直接隸屬於黨中央），三是金日成抗日的戰友及元老子女。前兩者自然效忠金正日，抗日與革命元老或許對金正日有點意見，但還不致於嚴重威脅到金正日的地位。儘管如此，以金正日為核心的領導階層並非完全水乳交融，據說金正日未能繼任國家主席與黨的總書記，係因政治局與軍方（中央軍委會）之間有嚴重的摩擦，因此金正日仍須拉攏軍方，以（破格）晉升將領、籠絡高階將領與黨軍關係改革（如成立幹部局，確保第一線指揮官的人事任用權）為手段，在軍中建立自己的人脈支柱。軍方對政治的影響力也隨之增加，成為領導階層的重要勢力。¹⁷

金正日疑似中風或重病之後，再度現身，於2010年的勞動黨代表大會中欽定金正恩為其接班人，同時組織準攝政團隊，輔佐金正恩鞏固權力。金正日的布局是任命其妹金敬姬為黨政治局委員，任命妹夫張成澤為黨政治局候補委員與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為金正恩建立黨政與軍事兩大側翼，鞏固金正恩政權。金正日死時，金敬姬任勞動黨輕工業部部長，也是政治局正式委員，更在2010年9月與金正恩同獲黨代表大會所授之「大將」稱號，成為北韓第一位女性「大將」，似乎可推斷金正日已規畫由其輔佐金正恩。張成澤曾在2004年獲罪（結黨營私）而遭革職，2006至2007年才重獲金正日重用，擔任公安與司法機構等要職，2010年6月更被任命為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曾因張成澤而被連坐降職的黨秘書崔龍海與體育相樸明哲亦官復原職。張成澤的親信分布在黨、政、軍、特等領域，其兄長張成佑與張成吉亦為軍隊高階將領，張成澤的勢力極為龐大。金正恩既倚賴其姑姑與姑丈，卻又不得不防範某種政變或遭到架空的可能性。¹⁸金正恩能否實質掌握軍事權力，起初要看李英浩的角色。為協助金正恩接班，金正日自2009年起即陸續撤除革命元老將領，代以少壯派將領，其間李英浩從平壤防衛司令部司令晉升為總參謀長，並獲授「大將」的軍銜，2010年9月又被任命為「次帥」，也擔任勞動黨中央軍委會副委員長，是少數未遭撤換的高齡將領（1942年出生，2014年已72歲）。總參謀部自此超越人民武力部（Ministry of People's Armed Force），成為北韓軍隊的指揮中心。其他未被撤職替換的老將領多在國防委員會，影響力不大，可能隨時間而凋零，逐漸離開權力核心。¹⁹多數老將領遭到撤換或解職、轉職，那麼他們集結起來反對金正恩的可能性就不太高。即使李英浩有異心，恐怕也會孤掌難鳴。李英浩後來的下場，也顯示金正日的布局為金正恩的接班奠定比較鞏固的

註¹⁷ 李明，「金正日接班前景與北韓政局」，*亞洲研究*，第19期（1996年9月），頁61-66、71-72；李基遠著，金中燮譯，「後冷戰時期北韓之總體問題：金正日之權力與軍方之關係」，*亞洲研究*，第19期（1996年9月），頁18-23。

註¹⁸ 劉德海，「北韓領導金正日過世後東北亞區域情勢展望」，*展望與探索*，第10卷第1期（2012年1月），頁17-22；安勇炫，「能相信的只有親人，金正恩姑母迅速崛起」，*朝鮮日報中文網*，轉引自聯合報，2011年12月23日，版A18；唐榮麗、陳文和，「姑丈攝政，推手還是對手？」，*中國時報*，2011年12月20日，版A2。

註¹⁹ 李龍洙，「後金正日時代，北韓權力如何歸屬？」，*朝鮮日報中文網*，轉引自聯合報，2011年12月20日，版A2。

基礎。

在 2012 年 4 月的朝鮮勞動黨第四次大會，金正恩獲選為第一書記（First Secretary）、勞動黨政治局委員、政治局主席團主席、勞動黨中央軍委會主委。第 12 屆最高人民會議（Supreme People's Assembly）五中全會也推舉金正恩為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於同年 12 月 30 日宣布，根據金正日的遺訓，推舉金正恩為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2012 年 7 月 17 日，金正恩獲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元帥」的稱號。金正恩的權力結構自此大致鞏固。^⑮

金正恩繼位，是否能安坐大位，各方看法不一。美國研究北韓的專家認為，北韓將以金正恩為中心，形成初步的集體領導，包括姑姑金敬姬掌握黨政體系，姑丈張成澤擔任國防委員會副主席，以及最資深的將領李英浩。^⑯也有人認為，金正日喪禮中扶柩的 7 人是未來北韓的領導核心，除了前述金正恩、金敬姬、張成澤之外，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宣傳書記金基南與教育科學書記崔泰福的地位非常重要。金基南是宣傳與洗腦的專家，崔泰福的意義似乎顯示金正恩企圖強調科技發展。其他在靈車旁邊的四名將軍與張成澤同屬軍系，其中有參謀總長李英浩，人民武力部長金永春是金正日的左右手，人民軍總政治局（General Political Bureau）第一副局長金正閣的任務是監控軍隊的思想與行為，國家安全保衛部第一副部長禹東測掌握公安，因協助金正恩而不次獲得拔擢。^⑰

另一種看法則是將北韓的領導階層分成四派：第一派是金正恩與其親信禹東測；第二派是支持金正恩的張成澤及其軍方勢力；第三派是革命元老派，以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長金永南為主；第四派也是革命元老派，但反對金正恩接班，以前人民武力部部長金一哲為代表。綜觀此一態勢，金正恩似乎是積極拉攏革命元老及其子女的支持，削弱其他不太支持他的元老勢力。例如，崔賢、吳振宇、吳白龍等抗日游擊隊員當初擁立金正日，他們的兒子崔龍海、吳日正、吳錦哲及吳哲山兄弟，屬於老臣第二代。^⑱不過，這些老臣第二代的年齡都比金正恩高一輩。

金正恩繼位，延續金氏帝王體制，但他是否能像其祖父與父親一樣，仍然牢牢掌控所有權力，正、反與樂觀、悲觀意見所在多有。金正恩的麻煩是他不像金正日一樣，有較長的時間（30 多年）歷練各種職務，學習掌權操控，因此他必須在極短的時間內掌握黨政軍的運作，以鞏固權位，期間有很多變數，在在都可能動搖其地位與權力。可以確定的是金正恩勢必緊抓軍權與思想控制，未來要看金正恩與攝政團隊之間的關係如何變動。可能性之一是金正恩逐漸掌握實質的軍權，攝政團隊逐漸退出決策圈。可能性之二是金正恩與攝政團隊共治，以穩定北韓政局，再往第一種可能性發展。可能性之三則是金正恩逐漸遭到架空，攝政團隊形成集體領導的局勢。

註⑮ Avram Agov, "North Korea: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Change," *Harvard Asia Quarterly*, Vol. 15, No. 1 (March 2013), pp. 16~17.

註⑯ 任中原，「穿軍裝亮相，張成澤權力在握」，*聯合報*，2011 年 12 月 26 日，版 A14。

註⑰ 楊明暉，「扶柩七將，新君的顧命大臣」，*中國時報*，2011 年 12 月 30 日，版 A19。

註⑱ 馮克芸、陳世昌，「老臣第二代，金正恩拉攏效忠」，*聯合報*，2011 年 12 月 23 日，版 A18。

最近的新聞報導顯示，金正恩若不解決攝政團隊，就是被攝政團隊架空，甚至可能有殺身之禍。金正恩痛下殺手，乃是必然的選擇。李英浩、張成澤等攝政團隊免死狗烹，只是時間問題。金正日欽定金正恩為接班人之後，即已開始權力布局。2009年2月，金英澈上將擔任新設的人民軍偵查總局（Reconnaissance General Bureau）局長。4月，禹東測擔任國家安全局（State Security Department）副局長。金京玉擔任勞動黨組織部（Organization and Guidance Department）第一副部長。2010年6月，張成澤出任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不支持金正恩的將領分別遭到革職，或是無法進入軍委會與政治局。2009年11月起，金正恩即開始掌握人事與情報事務，直接聽取人民保安部（Ministry of People's Security）的報告。^⑩

2010年9月，北韓勞動黨代表會的閉幕典禮中，金正恩獲推選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首創之職位）與四星上將，排名僅次於金正日。^⑪北韓政權也將金正恩塑造為新的偶像領袖，如「軍事天才」、「偉大的接班人」，以及稱頌金正恩的歌曲「腳步」。^⑫北韓黨國體系的重要人事與職務，包括人民武力部部長金永春、國家安全保衛部（偵搜逮捕異議人士）第一副部長禹東測、總政治局（軍隊思想與監視工作）第一副局長金正閣、人民保安部（監控人民）部長李明秀，以及勞動黨組織部（監視幹部）第一副部長金京玉等，似乎都是金正恩的心腹親信。^⑬

2012年4月，第4次黨代表大會推選金正恩為勞動黨第一書記與軍委會主席。第12屆最高人民會議推選金正恩為國防委員會第一委員長，金正恩也趁勢晉升70名將官，以鞏固軍權。其姑丈張成澤與親信李勇武仍保有副委員長之職。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崔龍海、北韓人民將軍金元洪、公共安全部長李明洙也獲選為國防委員會委員。^⑭再加上4月11日北韓勞動黨召開的黨代表會議推舉金正恩為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長、政治局常委，黨的「第一書記」，^⑮金正恩的權位愈來愈穩固，也準備清理攝政團隊。

2012年7月15日，北韓人民軍最高階領導人與總參謀長李英浩遭到政治局全面解職，理由是生病，實際原因則各方多有推測，如位高震主（非金氏家族所能擔任的

註⑩ 人民軍偵查總局整合35局（Office 35）與勞動黨的作戰部（Department of Operation）。組織部為2004年勞動黨組織重整時設立。參閱 Mun Suk Ahn, "Kim Jong-il's Death and His Son's Strategy for Seizing Power in North Kore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9, No. 4 (July-August 2012), p. 31.

註⑪ 劉于甄，「金正恩『可以沒子彈』，上台先休兵」，*商業周刊*，第1269期（2012年3月19日），頁94-95；Mun Suk Ahn, "Kim Jong-il's Death and His Son's Strategy for Seizing Power in North Korea," p. 33.

註⑫ 金珉澈，「『尊敬的天降偉人』，金正恩偶像化加速」，*朝鮮日報中文網*，轉引自聯合報，2011年12月21日，版A6。

註⑬ 閻紀宇，「金正恩親信四人幫，掌情治機關」，*中國時報*，2011年12月28日，版A12；劉德海，「北韓領導金正日過世後東北亞區域情勢展望」，頁18-19；聯合報編譯組，「翅膀硬了，金正恩除姑丈人馬」，*聯合報*，2012年7月4日，版A14。

註⑭ 陳韻涵，「為鞏固軍權，金正恩升70將官」，*聯合報*，2012年4月15日，版A18；Mun Suk Ahn, "Kim Jong-il's Death and His Son's Strategy for Seizing Power in North Korea," p. 35.

註⑮ 聯合報編譯組，「金正恩升任國防委員長」，*聯合報*，2012年4月14日，版A4。

最高職務，如中央軍委會副委員長，可能制約金正恩對軍方的控制力)、權力鬥爭(總政治局局長崔龍海與張成澤鬥垮李英浩)與世代交替(李英浩70多歲)。^⑤次日，北韓媒體報導金正恩獲授最高軍銜「元帥」一職，似乎顯示金正恩已完全掌控軍權。^⑥但根據最新報導，北韓人民軍參謀總長李英浩抗拒解職，人民軍總政政治局局長崔龍海(張成澤親信)執行命令時，遭到李英浩及其隨扈的激烈反抗，雙方發生槍戰，據說傷亡20餘人，李英浩非死即傷。^⑦

2013年12月初，金正恩下令逮捕張成澤，安上「反國家」等諸多罪名，並迅速公審處決。^⑧從金正日2011年死亡，金正恩正式繼位，到2013年底，3年之內金正恩即迅速肅清攝政團隊。當時扶柩的8人當中，除了金正恩之外，7人已有5人被金正恩撤職或處決。人民軍總參謀長李英浩、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張成澤、人民武力部部長金永春，人民軍總政治局第一副局長金正閣，國家安全保衛部第一副部長禹東測，相繼被捕或免職，剩下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金基南、最高人民會議議長崔泰福，都是沒有槍桿子的文官，不可能威脅到金正恩的權位。^⑨

二、古巴的政治菁英與領導階層

1990年代，古巴的統治菁英集團即經歷數次汰換與世代交替。首先是1989年的官員販賣毒品案，許多中高階軍方與國安部門官員遭到撤換。1991年的中央委員會改選，三分之二以上都是新人，包括50歲以下的新人、人民代表，只不過1997年的黨代表大會走回頭路，中央委員會人數從225人減少到150人，黨幹部、軍官與政府官員捲土重來，人民代表大幅減少。1993與1998國民大會(National Assembly)代表的選舉也呈現類似的模式。第四次是1994年，14名省委書記有半數下台，換上7名較年輕的世代。再來是1995年的國務委員會(Council of State)閣員大洗牌，7位較年輕的、支持改革的官員主掌財經部會，低階的古巴共產黨幹部與群眾組織也大幅換血。^⑩不過，1990年代這幾次換血與世代交替，有突發的，也有反轉的，菁英接班與世代交替還不算制度化，而且卡斯楚兄弟仍為統治菁英的中心，牢牢掌控黨軍政情之大權，並未因「蘇東波」風潮與所謂「第三波民主」而出現傾頹之勢。

進入21世紀，卡斯楚年事已高，其子女對政治亦無興趣。^⑪2006年因健康狀況不足以繼續操持國事，為穩固政權，由其弟勞爾代掌大權，並於2008年2月正式交棒，勞爾於2008年2月繼任國務委員會主席(國家元首與最高行政首長)，即重組領導階

註⑤ 彭淮棟、李京倫，「因病？失勢？北韓人民軍總參謀長被解職」，*聯合報*，2011年7月17日，版A14。

註⑥ 彭淮棟，「完全掌權，金正恩獲封北韓元帥」，*聯合晚報*，2012年7月18日，版A6。

註⑦ 張嘉浩，「北韓駁火奪次帥兵權，廿餘死」，*中國時報*，2012年7月21日，版A1。

註⑧ 王麗娟，「張成澤被捕，北韓媒體宣揚」，*聯合報*，2013年12月10日，版A18。

註⑨ 「金正恩的霹靂整肅」，*中國時報*，2013年12月11日，版A12。

註⑩ Marifeli Pérez-Stable, "Caught in a Contradiction: Cuban Socialism between Mobi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2, No. 1 (October 1999), pp. 72-73.

註⑪ 陳小雀教授提供的資訊。

層。勞爾首先任命政治局 3 名委員，隨即換掉年輕的強硬派委員，任命效忠自己的政治菁英。這些被撤換的人都是卡斯楚一手提拔培養的政治菁英，也是 1990 年代末期古巴「思想之戰」(battle of ideas) 的發動者，更是最高統帥協調支援團 (the Coordination and Support Group of the Commander in Chief, *Grupo de Coordinación y Apoyo del Comandante en Jefe*) 的重要幹部。2009 年 2 月，勞爾重組內閣，換上自己的人馬，尤其是來自軍方與軍事企業的幹部。^②政治局委員與國務委員會副主席拉吉 (Carlos Lage) 與政治局委員、副主席拉索 (Esteban Lazo) 接任主席的呼聲頗高。國民大會主席亞拉康 (Ricardo Alarcón) 與羅克 (Felipe Pérez Roque) 雖有可能，但不為勞爾所喜。只有德爾托羅 (Ulises Rosales del Toro) 或許可以穩住軍心。德爾托羅是前參謀總長與糖業部部長，也是勞爾的親信之一，據說曾被派到歐洲學習資本主義企業經營與管理，支持經濟改革與務實路線，也是最可能接任國防部長的人選。如果勞爾之後是他接班，軍方應該不會有太大的異議。^③然而，勞爾於 2009 年拔除拉吉所有職位，羅克也於同年遭到勞爾逼退，德爾托羅自 2009 年 2 月起擔任副主席迄今。勞爾的大幅改組得到卡斯楚的背書，此一改組不僅讓勞爾更能鞏固其權力，新任外交部長由曾出使駐美的第一副部長帕里利亞 (Bruno Rodríguez Parrilla) 繼任，似乎也有意調整前部長與美國互動時採取的強硬路線。^④

儘管勞爾能重組領導階層，抵抗勞爾及其改革政策的保守勢力仍然強大，尤其是黨國體系的官僚，因為他們擔心改革會讓他們失去權位。雖然他們無法公開反抗與反撲，消極抵制與不合作還是迫使勞爾推遲召開「六大」，展開言論批判與肅清的行動，並推動黨政分立，亦即黨員身分不再是擔任政府官員的必要或先決條件。這個階段的重組不但進一步削弱古巴共產黨的力量，整肅卡斯楚之前培養的接班世代 (successor generation)，更強化軍方在國家機器中的地位與影響力。根據學者的統計，2011 年 4 月選出的 15 位政治局委員之中，軍方背景的委員即有 8 位。115 席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將近三成也是軍方出身。在 9 位同時擔任政治局委員與國務委員會委員的領導階層之中，3 人是革命世代，4 人有軍方背景。^⑤

2011 年 4 月 16 日，勞爾在哈瓦那的第 6 屆古巴共產黨代表大會中表示，古巴最高領導應建立職務任期制，連兩任限 10 年。依此一規定計算，若勞爾統治期間沒有任何意外，則勞爾將在 2018 年，也就是 87 歲時退位。^⑥2011 年 4 月 19 日，古巴共產黨「六大」於哈瓦那閉幕，勞爾獲推選為第一書記，權力的鞏固更進一步，類似「兄終弟及」的統治體系於焉完成。但古巴的政治菁英與領導階層仍然脫離不了老人政治的

註② Eusebio Mujal-León, "Survival, Adaption and Uncertainty: The Case of Cub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5, No. 1 (2011), pp. 155~156.

註③ Brian Latell, "Raul Castro: Confronting Fidel's Legacy in Cub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0, No. 3 (Summer 2007), pp. 60, 62.

註④ 尹德瀚，「古巴政府改組，勞爾大權鞏固」，*中國時報*，2009 年 3 月 5 日，版 A3。

註⑤ Eusebio Mujal-León, "Survival, Adaption and Uncertainty: The Case of Cuba," pp. 157~159.

註⑥ 陳世欽編譯，「卡斯楚時代幾年內落幕，古巴改革『總統任期限 10 年』」，*聯合報*，2011 年 4 月 18 日，版 A14。

局面。職務的任期限制（兩任不得超過十年）表面上是推動政治菁英接班的制度化，實際上在古巴政治局的新組成當中，15名成員只有3名是新人。老人中勞爾已經83歲，第二與第三名委員也都在80歲上下。^⑳如果勞爾真的在2018年退位，最可能接班的可能是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迪亞茲·卡內爾（Miguel Díaz-Canel Bermúdez，1960年生）。不過，假設勞爾中途病故，群雄可能相互鬥爭，勝出者是強硬派或改革派，是持續獨裁領導，還是形成集體領導的格局，猶在未定之天。即使勞爾在退位之前指定接班人選，安排新的領導團隊，克里斯瑪領袖將難再現，集體領導是比較可能的結果。不管是哪一種發展，軍方都將扮演重要的角色。軍方也可能自成一派或勢力，爭奪國政領導大權。軍方內部的派系問題與陣營對壘，也是重要的變數。

肆、黨國體系

一、北韓的黨國體系

北韓的黨國體系肇始於金日成，在金正日繼位之後有所轉變。金日成經歷重重政治鬥爭，於1950年代鞏固其大權，並於1955年提出主體哲學（Juche Philosophy），做為其極權統治的意識形態支柱。北韓的極權統治形成金日成、勞動黨、官僚體系的金字塔階層體系。1972年通過的憲法設置共和國主席一職，由金日成擔任，最高人民會議（立法機構）與國務委員會（State Administrative Council，行政機關）皆在國家主席之下，黨位於軍方與政府之上，完全掌控官僚體系。^㉑

金正日繼位與守完3年父喪之後，即逐步重組其父建構的黨國體系，其特色是更加務實的決策模式。這種制度調整與決策模式有其國內外政治背景。在國內，金正日必須在革命元老的包圍之下鞏固大權與大位，也必須解決經濟與饑荒問題。在國際上，蘇聯與東歐共產國家的倒台，使得北韓失去奧援。1992年的修憲拿掉馬列主義，確認主體思想實際的指導地位。1998年的修憲有四個重點。第一，前言中定義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憲法就是「金日成憲法」，以鞏固金正日的統治地位與政治繼承的合法性。第二，軍方的地位提高，亦即「先軍政治」（Military First），軍事體系與勞動黨、內閣平起平坐，共同接受金正日的領導。第三，改國務委員會為內閣，強化行政體系的力量。第四是重組並強化國家安全部門，金正日與少數人完全掌控安全部門，各子部門彼此互相制衡。^㉒

北韓的黨國體系建立在先軍政治之上。先軍政治源自金日成抗日武裝鬥爭的經驗，他組織率領的反日游擊隊確立先軍革命領導的思想基礎。1960年代，金正日繼承金日成的先軍革命領導，掌握軍權，並於1990年代提出先軍政治的論述。先軍政治的

註⑳ 郭崇倫，「古巴革命原地打轉」，中國時報，2011年4月26日，版A15。

註㉑ Patrick McEachern, "Interest Groups in North Korean Politic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No. 8 (May-August 2008), pp. 239-242.

註㉒ Patrick McEachern, "Interest Groups in North Korean Politics," pp. 242-251.

意思就是軍隊為國家政治與經濟的中心，既要保衛國家，也是國家建設與發展的主力。1998 年第 10 屆最高人民會議通過的新憲法規定：最高人民會議之中的國防委員會是國家體制的中樞，凌駕於最高人民會議的常設委員會與中央人民委員會之上。先軍政治有四大重點：軍隊地位高於工、農、知識分子；領袖治軍，以軍隊統理所有政務；保障軍費投入；強化軍隊的凝聚力。^⑩先軍政治就是牢牢掌握軍權，維護並鞏固金正日及其繼承人的統治權威與地位。

先軍政治的組織基礎在於嚴密的指揮與控制體系。北韓的軍隊有兩個指揮主軸，一是軍事指揮體系，二是朝鮮勞動黨的指揮體系，後者是最高指揮中心。朝鮮勞動黨代表大會（Korean Worker's Party Congress）之下有中央委員會（Party Central Committee）與中央軍事委員會（Central Military Committee），前者由總書記擔任主席，後者是軍方的決策核心，與組織部並列為勞動黨最重要的部門。軍委會負責軍事決策與執行，人民武力部轄下的總政治局則是軍方政策執行的主要機制。在政府部門，最高人民會議之下的國防委員會（National Defense Commission, NDC）是軍方的實際指揮中心，主席當然是由總書記金正恩（之前為金正日）擔任。國防委員會指揮人民武力部、國家安全局與情治單位等。人民武力部之下的總政治局如前所述，是該部權力最大的單位。這種嚴密的軍事組織與指揮體系，完全在國家領導人與總書記一個人的手上。人民軍的任務不只是國防，也包括國內的秩序控制與情報蒐集等。人民軍不只是國家的軍隊，也不只是黨的軍隊，更是國家領導人個人的鐵衛隊。保護國家領導人，就是保衛黨與國家。^⑪透過勞動黨黨章的規定（人民軍是勞動黨的武裝力量；人民軍設黨委員會；人民軍總政治局直屬黨中央委員會）與組織體系（各軍種設黨組織，各級軍隊設軍事委員會，以及設置人民軍總政治局），確立軍隊是「黨的軍隊」、「革命的軍隊」與「金日成的軍隊」，再隨著政治繼承，將軍隊轉變為「金正日的軍隊」與「金正恩的軍隊」。^⑫

這裡必須指出兩點。首先，金氏政權為防軍權旁落或軍方政變，早已設計複雜的防範機制。除了「黨指揮槍」（其實是金氏父子透過黨組織控制軍方）之外，軍方、國安與情治機構彼此交叉支援，鞏固金氏政權與金日成、金正日與金正恩家人的人身安全，也互相監控。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指揮所有國安部門、情治機構的運作，軍方則分為人民保安部、國家安全局、人民武力部及其所轄總政治局、安全司令部（Security Command）、軍事保密司令部（Military Security Command，與總政治局對應，負責國內反情報工作，監視軍方與高階將領）。這些都會局處各自向金氏政權負責，金氏政權也在軍方與常備部隊之外另設武裝部隊（約 1 萬 8,900 人），警衛司令部（Guard Command）約 5 萬人（三個旅），直接向金正日（及金正恩）負責，保護金氏家人與高階將領的安全（包括監視將領），防範政變，並與平壤保衛司令部（Pyongyang Defense

註⑩ 張慧智、李敦球，北韓：神秘的東方晨曦之國（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8 年），頁 43-44。

註⑪ Kong Dan Oh and Ralph C. Hassig, *North Kore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pp. 113-114, 116-118.

註⑫ 李基遠，「後冷戰時期北韓之總體問題：金正日之權力與軍方之關係」，頁 12-15。

Command, 7萬人的軍團)、警衛司令部防空火炮部隊 (Pyongyang Antiaircraft Artillery Command) 共同防範政變與保衛首都。這些部門與機構相互合作,鞏固金氏政權,彼此之間卻很難串聯共同「謀反」或發動軍事政變。^④

金氏政權維持先軍政治,嚴密掌控軍方,另一方面也回復勞動黨的組織運作。2010年9月召開的第3次勞動黨代表大會,開始活化勞動黨,包括中央委員會、政治局與軍事委員會。軍委會不再是偶一為之的諮詢機構,而是金氏掌握軍方與國防權力的機器之一。軍委會、政治局與中央委員會的成員大幅換血,金正恩的人馬全面進駐黨組織。各省省委書記,也都換上金正恩的親信,讓金正恩充分掌握地方黨政體系。金正日時代的「三個革命隊伍運動」(Three Revolution Team Movement, TRTM)於1995年解散,但在2000年後有再生的跡象,2011年活躍起來,其目的應該是協助鞏固金正恩的統治。^④

二、古巴的黨國體系

古巴共產黨的角色自始並非以黨領政,而是建構並維持政治的恩庇侍從網絡 (patronage network)。1959年的革命推翻巴斯蒂塔 (Ruben Fulgencio Batista Zaldívar) 政權,但古巴共產黨到1965年才成立。1970與80年代憲法通過、建立蘇維埃式經濟體系與行政改革之後,共產黨才逐步掌握國家機器。統治菁英都是古巴共產黨的高階幹部,共產黨的主要任務是管理黨國官僚體系,協調群眾組織的動員。卡斯楚還另外成立青年幹部組織:最高統帥協調支援團。這個團的幹部直接向卡斯楚負責,可隨時視察各部會、國有企業與集體農場。1980年代中期的「調整階段」(Rectification Period)、蘇聯瓦解,以及1990年代初期的「特別階段」(Special Period, Período Especial),也可以看到古巴共產黨的式微。^⑤

古巴黨國體系內部的權力結構特質是以黨與軍方為權力核心,但黨與軍的勢力時有消長。1960年代之前是「古巴革命軍」(Revolutionary Armed Forces, 以下簡稱革命軍)主導的局面,1960年代初期逐漸此消彼長,轉變為1970年代中期的黨與革命軍相對平衡的局面。1980年代中期,勞爾與古巴共產黨對革命軍的控制愈來愈強。1986年「三大」之後,軍方在古巴共產黨的影響力日益式微。卡斯楚為鞏固政權,防範某些將領尾大不掉,難以控制,還發動全民戰爭 (War of All People, *Guerra de Todo el Pueblo*),降低革命軍在內部防衛的角色,對外防衛的責任則轉移給150萬名國土民兵

註④ Daniel Byman and Jennifer Lind, "Pyongyang's Survival Strategy: Tools of Authoritarian Control in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1 (Summer 2010), p. 68; Ken E. Gause, *North Korea Under Kim Chong-il: Power, Politics, and Prospects for Change*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Praeger, 2011), pp. 67-68. 平壤保衛司令部的簡介,可瀏覽 "Pyongyang Defense Command," North Korea Leadership Watch, <<http://nkleadershipwatch.wordpress.com/dprk-security-apparatus/pyongyang-defense-command/>>.

註④ 三個革命隊伍運動是金正日推動意識形態、科技與文化快速進步的工具,主要是派遣青年團隊到工廠、企業與集體農場,參閱 Mun Suk Ahn, "Kim Jong-il's Death and His Son's Strategy for Seizing Power in North Kore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9, No. 4 (July-August 2012), pp. 29, 34.

註⑤ Eusebio Mujal-León, "Survival, Adaption and Uncertainty: The Case of Cuba," p. 154.

(Territorial Militia Troops, MTT) 與共產黨控制的 1300 個防區。卡斯楚兄弟還下令逮捕歐朝亞將軍 (General Arnold Ochoa)，加諸叛國、違背革命價值等罪名，送軍法審判處死，趁勢清算可能懷有貳心的將領，並在黨、政、軍體系安插勞爾的親信幹部與支持勞爾改革路線的軍官。這種權力平衡變化的背後，反映出卡斯楚政權對革命軍將領忠誠度的懷疑與防範。懷疑的原因與背景包括棄職潛逃日增、古巴革命軍的現代化與專業化帶來的自主性、蘇聯改革開放對古巴受訓軍官的影響，以及革命軍參與非洲安哥拉戰爭所獲得的聲望與自信。經過一連串清算鬥爭，勞爾掌控軍方的權力日益穩固。^④

勞爾一方面清算革命軍勢力較大的將領，消除其專業化與制度的自主性，另一方面加強古巴共產黨在革命軍中的地位，包括組織、監視與意識形態教育。革命軍中央政治局 (Central Political Directorate, DIPC-FAR) 聯結共產黨與軍方，對中央委員會負責，其任務包括革命軍的意識形態教育、軍官團對革命的承諾、隨時備戰等。共產黨在革命軍的主要任務是確保軍隊的忠誠與紀律。相對地，革命軍在中央委員會的席次比例日減，尤其是 1991「四大」之後。不過，在勞爾確定掌握黨政軍大權與 1997 年「五大」之後，軍方在政治局的席次增加，在中央委員會的席次比例也有回升。^⑤

近年來古巴黨國體系的特質是革命軍的地位凌駕於古巴共產黨之上，由勞爾指揮。早在 1980 年代中期，勞爾即將資本主義的企業管理知識引進軍營企業，許多軍營企業幹部後來都成為政府各部會的部長或次長。革命軍轉向經營事業，本來是為了彌補蘇聯軍援減少與預算縮減造成的損失，期望能自給自足，並協助農業生產 (如青年勞動軍 Youth Labor Army)，提高國有事業經營效率。1980 年代末期起，許多革命軍軍官接受企業組織與經營技巧的訓練，並將這些知識與技巧應用在軍營企業，轉移給民營企業。軍營企業也成立一家控股公司 (*Grupo de Administración Empresarial, GAESA*)，其合作夥伴包括在古巴投資的主要外商。古巴革命軍部 (Ministry of Armed Forces of Revolutionary, MINFAR) 之下的經濟事務局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ffairs)，負責軍營事業，主要幹部均為勞爾的親信軍官，軍營事業橫跨各產業部門，包括農產品 (糖業)、軍事物資、生技製藥等。軍營事業不但有助於國家經濟發展，也可提振士氣，渡過艱困的「特殊階段」，增加就業機會與管理職位。1990 年代起，軍營企業家 (military entrepreneurs) 崛起，軍營事業也成為政府官員與公務員裁撤後的去處。軍營事業的經營範圍涵蓋國家主要產業部門，如旅遊、農業、電信與採礦等。進入二十一世紀，軍方幾乎成為太上國家機關，國防、內政與國內安全偵防等，都納入軍方的指揮體系。勞爾繼位，軍方出身的幹部與技術官僚，可望進一步掌握經濟政策的制定與權位。^⑥若軍方的力量愈來愈大，凌駕在黨之上，屆時可能會造成黨與軍方的對立與鬥爭。勞爾的接班人是否能維持雙方的平衡，還有待觀察。

註④ Frank O. Mora, "From Fidelismo to Raulismo: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in Cub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46, No. 2 (March-April 1999), pp. 29-30, 32, 34, 36.

註⑤ *Ibid.*, pp. 31-32, 36.

註⑥ Eusebio Mujal-León, "Survival, Adaption and Uncertainty: The Case of Cuba," pp. 153-154; Frank O. Mora, "From Fidelismo to Raulismo: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in Cuba," pp. 33-34.

伍、意識形態的形成與轉變

一、北韓的意識形態

北韓的意識形態表面上奉行社會主義與馬列主義，實際上是主體哲學。主體哲學又稱主體思想，是朝鮮勞動黨的中心思想，也是北韓式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礎與指導原則。據說金日成於 1955 年提出主體思想，原意是要壓制、解決勞動黨內的「蘇聯幫」與「中國幫」之間的矛盾與衝突，擺脫蘇聯與中共的操控，鞏固金日成的統治地位與權威。金正日於 1982 年闡釋的主體思想則宣稱以人為中心，人民與大眾是歷史發展的主力，主要原則是堅持政治自主、經濟自立與國防自衛，追求創造性方法（依靠人民大眾、符合實際），以及改造思想與政治事業優先。金正日更進一步把主體思想與金日成的領導思想合而為一，訂為勞動黨的領導思想，以鞏固自己繼承統治的正當性。主體思想有三大層面：政治自主是指民族自主掌握命運與政權；經濟自立是指經濟建設獨立自主，自給自足，完全不依附其他國家；國防自衛則是指國防建設自力更生，強化國家自衛能力。^④

主體哲學穿透北韓的政治結構、經濟體系與社會組織，帶有強烈的仇外、反外、反帝國主義思維，是一種發展導向的民族主義（developmental nationalism）。^⑤也有學者認為，主體哲學宣稱以人為根本價值，其實這種世界觀是融合中國與東歐思想的產物。所謂以人為本，源自儒家（教）思想。主體思想不但是馬列主義的朝鮮化，更模仿史達林主義的恐怖統治與毛澤東思想（包括延安時期的毛思想與後來的大躍進運動）。^⑥更有學者認為，儒教穿透朝鮮的社會文化，形成朝鮮文化深層的思想結構，也是主體思想、金氏家族的「家天下」（family state）與「朕即國家」式皇朝共和國（dynasty republic）的思想基礎。北韓的社會主義民族主義（socialist nationalism）則是主體哲學的實踐（praxis），將過去游擊隊的英雄史神話化，建構未來的共產主義烏托邦。過去的神話奠定統治者個人崇拜的基礎，未來的美化則是統治者世襲罔替、壟斷權力的論述依據。^⑦

註④ 張慧智、李敦球，北韓：神秘的東方晨曦之國，頁 41~43。

註⑤ D. I. Steinberg, "On Patter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North Korea," in Samuel S. Kim, ed., *The North Korean Syste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 101.

註⑥ Grace Le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Juche,"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3, No. 1 (Spring 2003), pp. 109~111.

註⑦ Avram Agov, "North Korea: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Change," pp. 20~21。這裡必須強調，儒家思想與儒教或政治儒家、官方儒家是不一樣的。應該說北韓的主體思想是受到儒教的影響，或是受到法家化儒家、陽儒陰法的思想影響，而非受到儒家的影響。儒家強調的仁義禮智、忠恕之道與內聖外王論述，與主體哲學有相當的出入，請參閱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及「『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二文，收錄於：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市：聯經出版，1976年），頁 1~46 及頁 47~75。

主體哲學的起源有不同的說法。如上述金日成於 1955 年提出的主張，有人認為金日成的主體思想源自 1967 年 12 月 6 日對最高人民會議的致詞演說，1972 年確立為北韓的官方意識形態。主體哲學的提出可能是基於上述的工具論：擺平黨內親蘇與親中派的鬥爭，也可說是朝鮮半島長期夾處於周邊中、日、俄強權之間而產生的戰略指導原則，更有人說是金日成天才的創造。^{⑤③}也有人認為主體哲學可以追溯到朝鮮王朝，尤其是明朝滅亡與清朝滅亡之後，朝鮮儒家學者自認為朝鮮是儒家思想中心衰落之後在邊陲形成的正統。蘇聯瓦解與中國改革開放之後，北韓更自我標榜是社會主義的正統與最後堡壘，主體哲學正是這種思維的展現，也有其長遠的歷史脈絡。^{⑤④}

不論起源為何，主體哲學或主體思想明訂於北韓憲法第 3 條之中：主體思想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指導原則，是以人民為中心的世界觀，也是革命的意識形態，旨在促成人民群眾的獨立。^{⑤⑤}主體思想號稱是科學理論，是不可質疑的永恆真理與教條。質疑主體思想，就是挑戰金日成及其家族與繼承人。主體思想有三個特質。第一，主體思想是一種神話，是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馬列主義朝鮮化、理想的共產主義社會、朝鮮傳說中的太王（四神記）、朝鮮民族主義與民族自尊心，以及金日成半人半神論述的重組與再詮釋。全北韓的人民都要認真地學習金日成及其繼承人的教誨與指示，不斷地被洗腦與自我洗腦。第二，主體思想並非一成不變，還是會依據領導人的想法與他們想要解決的問題，調整其內容，如 1980 年勞動黨修改黨章，拿掉馬列主義的字眼。1992 年的憲法拿掉馬列主義的經濟意識形態，獨尊主體、黨與領袖。2009 年 4 月的修憲拿掉共產主義的字眼，也不再提馬列主義；如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國際主義之間的調和，（國家）獨立與（個人）創造力的互補關係，主體思想獨立自主的思維與接受外援之間的矛盾，「蘇東波」的原因等，統治者均設法自圓其說。第三，主體思想的調整始終圍繞在幾個主軸之上：如維持北韓的獨立自主，人民是國家的主人與領袖的堅貞信徒，保衛北韓的社會主義、主體與社會主義密不可分、馬列主義的朝鮮化等。^{⑤⑥}

金正恩繼位，北韓的意識形態似乎已有稍微轉變的跡象。李英浩被拔除後，金正恩不僅削弱軍方的經濟決策權，收回軍方控制的經濟資源，也在內閣之下設立「政治局」（與黨的政治局不同），並在勞動黨內設立「經濟改革小組」，參考中國經驗，推動農業與經濟改革。^{⑤⑦}金正恩出席的公開活動漸以經濟與輕工業為主。視察遊樂園時，更斥責官員經營管理不善。金正恩設立的「牡丹峰」團團員開始穿上迷你裙，平壤街頭也可看到女性穿高跟鞋。^{⑤⑧}國內研究北韓的學者也推斷，策畫天安艦與延坪島事件的軍

註 ⑤③ Grace Le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Juche," pp. 105, 107~109.

註 ⑤④ Avram Agov, "North Korea: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Change," p. 17.

註 ⑤⑤ "DPRK's Socialist Constitution (Full Text)," <http://www1.korea-np.co.jp/pk/061st_issue/98091708.htm>.

註 ⑤⑥ Kong Dan Oh and Ralph C. Hassig, *North Kore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pp. 13~22; Avram Agov, "North Korea: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Change," p. 21.

註 ⑤⑦ 李京倫，「傳北韓經改向北京學習」，聯合報，2012 年 7 月 21 日，版 A2。

註 ⑤⑧ 李京倫，「金正恩看迪士尼，跟上『世界潮流』」，聯合報，2012 年 7 月 21 日，版 A2。

頭多已遭撤換，金正恩看迪士尼的米老鼠表演，顯示他可能逐步以務實政治取代先軍政治，一方面削弱軍方的經濟決策權與資源控制權，另一方面也將統治的重心從過度倚重軍方，拉回到勞動黨與政府官僚體系。^⑤

然而，上述這些發展似乎只是樣板與裝飾。北韓突然在 2012 年 12 月 12 日發射銀河 3 號長程火箭，2013 年 2 月 12 日進行地下核試驗，4 月初又叫囂要對南韓與日本開戰，並封閉開城工業區，威脅要發射中程的舞水端飛彈。專家推測金正恩此舉是為了對內鞏固自己的統治威信，對外則是伺機要求美國解除對北韓的經濟制裁或增加金援。^⑥最後中國老大哥出面擺平，習近平接見特使崔龍海，要求北韓參與「六方會談」，北韓自然點頭稱是。^⑦但目前推斷或揣測北韓是否會採行類似中國的漸進改革路線，恐怕言之過早。

主體思想的確立與鞏固，自然要靠密集的、長期的洗腦與宣傳。金氏政權訓練一批知識分子為黨國宣傳。黨組織滲透到每個社會角落，特別是控制青年學子，如組織金日成社會主義青年團 (Kim Il-Sung Socialists Youth League)，訓練他們加入青少年與青年 (18-28 歲) 的政治教育工作。另一方面，也要控制各種資訊與消息，具體措施包括強化領袖的個人崇拜、建構抗日英雄的神話、鼓動仇外 (反美、反日、反南韓) 情緒，密集的、深入的政治教育，限制人民接觸外來資訊與外國人，以及彼此嚴密的監視與舉發、集中營與連坐法。^⑧

二、古巴的意識形態

自 1961 年美國策動的豬灣事件之後，卡斯楚即自稱其革命為社會主義的革命，他也自稱是馬列主義者，但卡斯楚的政治思想其實深受古巴歷史與政治文化的影響，尤其是荷西馬提 (José Julián Martí Pérez) 與切·格瓦拉 (Ernesto “Che” Guevara) 觀念的影響。^⑨馬提兼具記者、詩人與評論者的身分，曾領導古巴革命戰爭，但壯志未酬，在第二次古巴革命 (1895~1898) 伊始即戰死。^⑩然而，他的反殖民主義深深影響卡斯楚與切·格瓦拉。馬提的反殖民主義不只是反對殖民主義與帝國主義，背後更有深層的人本主義 (humanism)。不但要獨立自主，維護國家主權，更強調人的尊嚴與平等。馬提反對種族高低之分，夢想團結拉丁美洲國家，以大拉丁美洲對抗美國霸權。除了馬提之外，切·格瓦拉也直接影響古巴革命的意識形態。切·格瓦拉承襲馬提與馬克

註⑤ 郭乃日，「務實政治將取代先軍政治」，聯合報，2012年7月21日，版A2。

註⑥ 吳和懋，「金正恩『搗』蛋！一場非演不可大戲」，商業周刊，第1326期 (2013年4月18日)，頁46~47。

註⑦ 白德華，「習近平促開六方會談，金正恩同意」中國時報，2013年5月25日，版A16。

註⑧ Daniel Byman and Jennifer Lind, “Pyongyang’s Survival Strategy: Tools of Authoritarian Control in North Korea,” pp. 49, 51, 55~57.

註⑨ Max Azicri, “The Castro-Chavez Allianc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36, No. 1 (January 2009), p. 103.

註⑩ Mark Falcoff, *Cuba the Morning After: Confronting Castro’s Legacy* (Washington, D. C.: The AEI Press, 2003), pp. 13~14.

思（及恩格斯、列寧）的思想，主張革命應基於人的價值與人本主義，追求正義、真理、國家主權、拉丁美洲的大統合，以及國際主義（internationalism）與第三世界反壓迫的革命，反對階級與種族主義壓迫、資本主義剝削、宰制，其思想有一部分納入古巴憲法。^⑥

不過，學者芮比（Diana Raby）指出，1959~1963 年的古巴革命戰爭，起初並無明顯的社會主義、馬克思主義或共產主義的訴求。引導革命的思潮與觀念主要是古巴與拉丁美洲地區長期的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民族解放、民主與人本主義、社會正義與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等概念，以及激進社會革命的傳統，如反抗獨裁者馬查多（Gerardo Machado）與 1933 年失敗的革命。卡斯楚等人領導的古巴革命不是完全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沒有關係，而是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等意識形態、階級鬥爭思想並非革命開端的主力。芮比在 1990 年代訪問曾經參與「七二六運動」（26th of July Movement, M-26-7）的革命元老，得知他們最初起事的動機是追求社會正義、民主與反帝主義，並非遵循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或馬列主義的教條指導。古巴在 1960 年代初期之後，才採用蘇維埃模式，揚起社會主義的大旗，但當時有冷戰與抵抗美國霸權的時代背景與需求，而且古巴的意識形態有其獨特性與自主性，如「新人類」（New Men）與道德動機（支援拉丁美洲與非洲的武裝革命）。直到 1970 年代，古巴的理想主義策略連遭失敗，才更加倒向蘇聯。^⑦儘管如此，仍有人強調，古巴的意識形態不像表面上所標舉的社會主義這麼簡單，哲學家沙特訪問古巴新革命政權時，即指出古巴缺乏明顯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古巴的意識形態是革命實踐的產物，而非依照社會主義或馬列主義的革命公式，按部就班革命。卡斯楚領導的古巴革命，跟之前的數波革命一樣，背後有一貫的傳統：拯救、天職與犧牲（殉道）。古巴普及的醫療與教育制度，可說是這種精神與意索（ethos）的落實，與基督宗教的教旨有異曲同工之妙。^⑧

儘管如此，從 1960 年代初期到 1990 年代之前，古巴的官方意識形態一直掛著蘇維埃式社會主義的招牌。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瓦解之後，卡斯楚政權逐漸調整意識形態論述，仍以民族主義的認同論述為主。1986 年中，卡斯楚反轉 1976~1985 的市場社會主義政策，即使當時經濟困頓，也不願深化市場社會主義的改革。官方宣稱這是調整（rectifying）政策。蘇聯與東歐共黨國家垮台之後，古巴於 1990 年代試行局部的市場改革，但卡斯楚還是中途喊停，原因可能是擔心深化市場改革會削弱其統治基

註⑥ Clive W. Kronenberg, "Manifestations of Humanism in Revolutionary Cub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36, No. 2 (March 2009), pp. 67~76.

註⑦ Diana Raby, "Why Cuba Still Matters,"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Vol. 60, No. 8 (January 2009), pp. 1~7.

註⑧ Stephen Wilkinson, "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Cuban State," in Mauricino A. Font, ed., *Changing Cuba/Changing World* (New York: Bildner Center for Western Hemisphere Studies, 2008), pp. 13~16. Wilkinson 運用傅科（Michel Foucault）的牧民權力（pastoral power）概念，詮釋古巴何以在「蘇東波」與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國家瓦解，意識形態遭受質疑之後，仍能透過醫師（與護士）、教師、社工等類似牧師、傳教士的代表，提供完整的醫療服務、普及教育，並蒐集資訊，鞏固一黨與黨國體系的統治。

礎。1990年代的市場改革也極為有限，外貿部門開放幅度較大，但改革重點在於糧食生產的自給自足，而且國家機器仍強力執行其經濟計畫。也就是說，直到1990年代末期，除了反美帝與民族主義之外，古巴的意識形態仍在動員的政治（mobilizational politics）與市場改革之間擺盪。1997年古巴共產黨代表大會（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uba）與中央委員會的最後會議，拍板確認官方意識形態的內容，但古巴社會主義，其實與西方的社會民主大相逕庭，也與激進的或民主社會主義格格不入。^⑥古巴強烈的民族自尊心（識字率97%、醫療外交）與反美情緒，更是卡斯楚兄弟政權之所以鞏固的基礎之一。^⑦

也有學者認為，卡斯楚利用民族主義，反抗巴蒂斯塔將軍的革命，恢復1940年憲法，並獲得蘇聯提供的經濟與軍事援助，將古巴建設為極權國家。卡斯楚主義表面上奉行馬列主義，實質上是軍事階級（military class）統治的斯巴達主義與集體主義國家，外表加上社會主義與革命的修辭包裝。這種軍事階級統治的國家，精神上卻與西班牙殖民時代的統治模式相當類似。諷刺的是，卡斯楚是西班牙派駐古巴的士兵後裔，其任務是鎮壓那些爭取古巴自由的人士。卡斯楚政權反抗美國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卻可能是西班牙時代殖民主義與軍事階級統治的借屍還魂。^⑧

經過半個多世紀的社會主義政權與革命的社會主義，進入21世紀，官方口徑仍未放鬆社會主義的基調，但據傳卡斯楚接受大西洋月刊（*Atlantic*）訪問時，竟表示古巴模式不宜推廣到其他國家，因為共產主義連在古巴都行不通，遑論是其他國家。有人解讀卡斯楚這些話，認為他可能是為其弟勞爾的經濟改革創造氛圍。^⑨不過，卡斯楚是否真的這麼說？此種解讀方式是否正確？仍有爭議。^⑩有學者強調，早在1950~60年代革命期間（1959-1963），儘管未明奉社會主義為圭臬，古巴即已實行社會主義式的政策與措施，如農業改革法案（Agrarian Reform Laws）、大產業的國有化、推廣識字運動、免費的普及教育（初、中、高等教育）、免費的普及醫療、地方社區的民兵與群眾組織。戈巴契夫推動改革開放時，古巴堅決反對，亦無意跟進。儘管民眾生活困頓，

註⑥ Rafael Rojas, "The Content of Socialism in Cuba Today," *Internation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12, No. 1 (March 2010), pp. 59-61; Marifeli Pérez-Stable, "Caught in a Contradiction: Cuban Socialism between Mobi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pp. 69-72. 陳小雀教授受訪時即指出，古巴透過醫療外交（如協助拉丁美洲國家人民進行白內障手術），形成拉丁美洲國家聯合對抗美國的態勢。

註⑦ 古巴醫療外交的相關研究可參閱 Maria C. Werlau, "Cuba's Health-Care Diplomacy," *World Affairs* (March/April 2013), pp. 57-67; John M. Kirk, "Cuban Medical Internationalism and Its Role in Cuban Foreign Policy,"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20, Issue 2 (June 2009), pp. 275-290, 以及 John M. Kirk, "Cuba's Medical Internationalism: Development and Rationale,"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 28, Issue 4 (October 2009), pp. 497-511.

註⑧ Orlando Gutierrez-Boronat, "The Cuban Civic Movement. Steps to Freedom,"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Vol. 18, Issue 1/2 (September 2006), pp. 158-160.

註⑨ 泰國世界日報，「古巴卡斯楚承認：共產主義已行不通」，聯合報，2010年9月13日，版A25。

註⑩ 瀏覽 Nick Miroff, "The Cuban Model," *Global Post*, September 13, 2010,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cuba/100913/cuba-socialism-castro-reforms>>.

古巴在新世紀仍堅持社會主義政策與社會主義民主 (socialist democracy)，毫不考慮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古巴不採取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維持政策諮商與地方社區民主制度 (地方提名、選舉與秘密投票)。不僅如此，古巴更推動有機農業、都市農業與新能源 (太陽能與風力發電)，並與拉丁美洲國家 (尼加拉瓜總統查維茲、玻利維亞總統莫拉萊斯 Evo Morales、厄瓜多爾總統柯利亞 Rafael Correa)，推展新的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在蘇維埃模式與資本主義自由民主的經濟模式之外，另闢蹊徑。因此我們不宜跟隨西方媒體的報導與解讀，認為古巴必將轉往西方資本主義的道路或模式。^⑭

近年來，古巴再次逐步、小規模地調整經濟政策。勞爾繼位後，首先於 2010 年 8 月開放小規模私營企業經營，容許行之已久的觀光旅遊個體戶經濟。9 月 13 日宣布，將於 6 個月內裁撤 50 萬名公務員 (相當總數六分之一)，並輔導其轉業，措施包括發出 25 萬張小型企業執照，輔導被裁撤的公務員到民營企業找工作。第 6 屆黨代表大會也推出經濟改革方案，擬廢除食物配給的制度，開放私宅買賣、提高國營企業自主性、裁撤百萬個政府職位、吸引外資，社會福利支出也將採取「合理化」措施，但仍將維持健保與免費入學。^⑮ 12 月，勞爾進一步宣布開放古巴民眾出國旅遊，出國最長期限從 11 個月延長為 2 年，如此不但有助於防止人才外流，亦可創造旅遊商機。^⑯ 不過，這些改革與開放都不是突如其來的政策措施，1990 年代卡斯楚即已開放觀光客到古巴旅遊，以賺取外匯。^⑰

經濟改革顯示古巴領導人及其政府似乎有點模仿中國的改革開放策略，亦即官方口徑仍堅持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實際政策方向則以務實主義與漸進改革為主，市場社會主義的方向仍不明顯。無論如何，這裡必須強調，在古巴社會主義旗幟的後面，歷史、文化與宗教的特殊脈絡與背景，才是古巴官方意識形態最重要的根基。

陸、國家機關與社會的關係

一、北韓的集體動員與階級體系

北韓的集體動員源自 1940 年代後期的社會革命。透過土地的重分配與階級結構翻轉，北韓不但形成水平的社會分類 (性別、階級、職業等)，也形成垂直的階級組合 (核心階級 core class、搖擺階級 wavering class、敵對階級 hostile class)。階級結構的翻轉，是把傳統朝鮮社會的垂直階級結構倒轉過來。金日成打散朝鮮原本的階級結

註 ⑭ Diana Raby, "Why Cuba Still Matters," pp. 2, 8-13. 學者也可以質疑這些古巴民主制度的描述，畢竟此文是在左派觀點的期刊上發表。

註 ⑮ 陳世欽編譯，「卡斯楚時代幾年內落幕，古巴改革『總統任期限 10 年』」，聯合報，2011 年 4 月 18 日，版 A14；李鏞龍，「古巴經改，開放私宅買賣」，工商時報，2011 年 4 月 20 日，版 A8。

註 ⑯ 王麗娟編譯，「管制近五十年，古巴解除旅遊禁令」，聯合報，2011 年 12 月 23 日，版 A18。

註 ⑰ 陳小雀教授受訪時以其親身經歷指出，古巴在 1990 年代對外開放觀光旅遊的幅度與步調不大，但在 2000 年以後，即大幅開放，如觀光地區五星級大飯店的大量開發，顯示古巴亟欲藉此賺取外匯。

構，「解放」窮苦的農民，重塑階級或出身成分 (*songbun*)。金日成剝奪原先資產階級的財產，把勞工階級拉到最高的地位，尤其是家人曾參與抗日戰爭的工農階級。最底層的則是敵對階級與搖擺階級，包括地主、「韓奸」(為日本殖民政權工作)，以及背叛分子。向上流動幾乎不可能，但只要被控背叛、與較低階級的人結婚，或因親戚而受累，階級地位即急遽下滑。相對地，核心階級或忠於金氏政權的菁英階級(包括軍方)則享受各種生活的便利與舒適。韓戰與隨後的經濟計畫，則是承繼日本殖民時代的工業化基礎與高壓統治，依據戰時共產主義、集體主義與史達林主義，接受蘇聯的技術援助與物資，以經濟計畫與全面國有化模式發展重工業，以配給制等嚴密控制民生需求。1990年代的長期饑荒，更促成統治者倚賴群眾動員與集體主義的操作策略。換句話說，從日本殖民時代到金正日死亡之前，北韓的社會始終在國家機器的完全掌控之下，不像前蘇聯與東歐有知識分子、天主教、族群與種族，或其他相對自主的社會團體與組織，足以與國家機器抗衡。^⑦

從金正日死亡之前的閱兵、2010年勞動黨建黨65週年的大型團體操與阿里郎歌舞表演，到金正日死亡之後葬禮的舉行，各種影像顯示北韓的國家機器仍然有極強的集體動員能量：全國從上到下痛哭流涕，哀慟逾恆，如喪考妣。這些鏡頭與表演再次展現出國家機器的操作力道與民眾戲劇性表現哀傷的自我動員。

有學者認為，這種國家吞噬社會與操控被統治者的樣貌與模式，可稱之為「劇場國家」(*theater state*)：陵墓、雕像、閱兵與超大規模的慶祝活動、儀式、體育、舞蹈等，投射繁榮富強的印象，營造金氏王朝與人民和諧無間的神話景象。金日成及其繼承人神聖無上，金氏家族與國家融為一體，君愛子民，子民全心效忠金氏王朝，猶如金氏王朝身體的一部分。金日成及其繼承人則是黨、軍與人民三位一體的化身，也就是「一心同體」(*ilsim tangyol*)。^⑧金正恩政權仍在穩固權力，根本無意，也不可能推動政治民主化與自由化。

在這種集體動員的環境與氛圍之中，北韓要發展出雛型的市民社會或相對自主的社會團體，恐怕還要非常久的時間。即使有戲劇性的事件、出人意料的政治革命與外力介入，其結果也很難預料。相對於中國層出不窮的群體性事件與古巴國內、海外異議分子的活動，北韓仍處於極權主義與動員政治的狀態，看不出有鬆動的跡象。

二、古巴的市民社會

早在1933年的獨立革命中，古巴的市民社會即已萌芽，因為這場革命的主角是新興的中產階級。巴蒂斯塔將軍發動的政變卻摧毀這個剛萌芽的市民社會，卡斯楚參與

註⑦ Charles Armstrong, "Beyond the DMZ: The Possibility of Civil Society in North Korea," in Charles K. Armstrong, ed., *Korean Society: Civil Society,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191-207; Daniel Byman and Jennifer Lind, "Pyongyang's Survival Strategy: Tools of Authoritarian Control in North Korea," pp. 49, 61-62.

註⑧ Avram Agov, "North Korea: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Change," pp. 17-19.

發動推翻巴蒂斯塔將軍的革命，則更進一步壓制市民社會的生機。⁷⁹卡斯楚政權在 1980 年代成立國土民兵部隊，一方面是要制衡革命軍，另一方面也藉此再度集體動員，重燃革命熱情，振奮愛國心，加強對革命軍與人民的控制，尤其是讓古巴共產黨能再度牢牢掌控革命軍，鞏固卡斯楚政權，防範國內的反對與國外（美國）勢力的威脅。⁸⁰

有學者將古巴市民社會的演化分成三個階段。在 1959 之前，古巴的經濟發展還算不錯，但文盲過多，失業率甚高，市民社會並不發達。儘管如此，社會上仍有反抗巴蒂斯塔專制統治的力量。革命之後，自由組織與結社團體一一消失，但草根組織與基層社會運動仍然活躍，1960 年以來的古巴有蓬勃的社會與組織活動。到了 1970 年代，國家機器穿透市民社會，甚至可說是取代市民社會的角色與功能。經濟成長與順暢的社會流動，搭配意識形態的霸權，使得國家機器吞噬市民社會。1980 年代末期的「蘇東波」，導致古巴失去有力的奧援，國家機器控制社會的力道減弱，經濟危機與年輕世代的要求，迫使國家機器稍微退讓，市民社會的空間與組織再度發展，其先聲是 1980 年代中期興起的知識分子與專業人士組成的團體。1990 年代初期到中期，知識分子對古巴需要什麼樣的市民社會，多有論戰，反映出市民社會此一概念的複雜性。1990 年代中期，政府停止受理民間團體的登記，古巴市民社會的成長為之頓挫。⁸¹

無論如何，異議分子與批判的聲音仍能找到伸展的空間，獨立記者與異議人士，透過國際非政府組織與網際網路，批評、質疑卡斯楚政權的統治，部分異議人士甚至於 2002 年 5 月連署向國民大會陳情，要求推動經濟與政治改革，但卡斯楚政權毫不手軟，於 2003 年 3 月 18 日大舉逮捕異議人士、人權團體與市民社會領袖，判刑入獄，刑期少則 6 年，多則 28 年，並指控美國勢力在背後煽動操控。美國與歐洲聯盟嚴厲譴責古巴政府，前者維持禁運政策，後者則凍結與古巴的經貿與援助協定。面對國際壓力，卡斯楚堅決不願退縮，顯示古巴的經濟仍從屬於政治與權力，極權國家的鎮壓機器與力量仍不可忽視。⁸²

不過，政治犯的監獄可能是市民社會起死回生的主要地點。⁸³部分學者認為，古巴已經有初始的市民社會（proto-civil society）。截至 2007 年為止，古巴的獨立組織已達 350 個。人權團體、異議人士、天主教會的發展與活動，新世代年輕人的疏離、批判，以及各式各樣的非正式抵抗等，均顯示古巴的市民社會已稍有生存與運作的空間。⁸⁴不過，有學者以市民領域（civil sphere）的概念架構，探討民間（無組織的異議人士、有組織的異議團體、宗教與市民社會、獨立新聞媒體、私有小業主）挑戰卡斯

註 79 Orlando Gutierrez-Boronat, "The Cuban Civic Movement: Steps to Freedom," pp. 158~161.

註 80 Frank Mora, "From Fidelismo to Raulismo: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in Cuba," p. 30.

註 81 Jorge Luis Acanda González, "Cuban Civil Society: I. Reinterpreting the Debate,"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Vol. 39, No. 4 (January 2006), pp. 34~36.

註 82 Edward Gonzalez and Kevin F. McCarthy, *Cuba After Castro: Legacies, Challenges, and Impediment*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04), pp. 13~15.

註 83 Orlando Gutierrez-Boronat, "The Cuban Civic Movement: Steps to Freedom," p. 161.

註 84 Damián J. Fernández,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The Normalization of Cuba's Civil Society in Post-Transition," in Marifeli Pérez-Stable, ed., *Looking Forwar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uba's Transition*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pp. 101~113.

楚政權的成功機會，以及未來可能的演變路徑，結論是市民領域頂多只到浮現的階段，尚未厚實化（thickening）。古巴反美與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讓異議人士很難去除親美的色彩。國家機器的強力統治，尤其是軍隊與情治單位的控制，都使得現狀將持續至少五到十年，要等待政治機會的結構打開，才有可能討論成熟的市民社會與政治轉型。⁸⁵

另一方面，學者分析蓋洛普世界民意調查（Gallup World Poll）的問卷調查結果，發現古巴人民對政府的信心與教育程度（識字率高），對集體的國家自尊有正面影響，對政府的信心與集體國家自尊則是相互正面的影響，古巴人民對美國的負面評價，也促使人民支持政府，只有家戶所得是負面影響，但人民還算滿意經濟狀況與物質供給。由此觀之，美國政府不能只是期望卡斯楚兄弟政權自動垮台，民主轉型迅速到來。古巴人民對政府的支持有其社會經濟與心理基礎，並非完全誓不兩立。⁸⁶

然而，卡斯楚總有一天要離開人世，其弟勞爾也垂垂老矣，新一代領袖要如何鞏固其統治，推動經濟改革，因應市民社會的挑戰？如果經濟改革成效不佳，政治控制也有放鬆的跡象，是否會引發民眾的反抗？民眾的反抗是否會造成血腥與強力鎮壓？鎮壓無效的話，是否會受到國際譴責與禁運，以及國內更多的反彈與反抗，迫使領導階層推動政治改革，甚至被推翻？如果鎮壓收效，是否會促成威權統治的軍事政府，使得古巴共產黨更加弱化？反過來想，如果經濟改革成效不錯，是否會進一步發展出市場社會主義，讓軍營事業的高階幹部搖身一變，成為新的資本家？資本主義事業的發展，是否會引發政治改革與民主化的呼聲與要求，進而導引古巴的政治轉型，促使古巴轉向中期後極權主義？

這些問題都可能發展出不同的插曲。無論如何，卡斯楚主義（卡斯楚在古巴與中南美的革命理論與政策路線）逐漸褪色，勞爾主義（軍方角色的轉變，尤其是軍營企業與軍方控制國家機器）繼之而起，未來還有許多可能性。

柒、結 論

本文的主要問題意識是為什麼北韓與古巴能夠抵抗「蘇東波」與「第三波民主化」的浪潮，並試圖整理相關研究文獻與新聞報導，訪談長期研究古巴與拉丁美洲的學者，比較北韓與古巴政治體系的結構與組織，異同與特質，試圖探索北韓與古巴能

註⁸⁵ Gerardo Otero and Janice O'Bryan, "Cuba in Transition? The Civil Sphere's Challenge to the Castro Regime,"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44, No. 4 (Winter 2002), pp. 29~57。依據 Otero and O'Bryan 的定義，市民領域涵蓋市民社會，市民社會是指國家機關與經濟間的互動領域與社會運動、家庭親密關係等。

註⁸⁶ Jonathan Benjamin-Alvarado and Gregory A. Petrow, "Stability, Transition, and Regime Approval in Post-Fidel Cub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7, No. 1 (Spring 2012), pp. 73~103。該問卷調查為面訪，總計 1000 分，於 2006 年 9 月在哈瓦那、桑地牙哥（Santiago de Cuba）施測，統計分析以結構方程式為主。

夠抗拒民主化浪潮的原因與條件，討論其政治轉型的可能性。如此切入研究，主要是現有的理論或概念架構似乎難以完全解釋北韓與古巴的體制特質與政治轉型的問題，因此不擬套用現有的類型，也不打算直接建立新的分類架構，而是從四個層面切入，一一比較其體制特質與歷史脈絡的異同。

在政治菁英與領導階層方面，北韓與古巴的政治繼承與權力接班皆以統治者的家族為核心，前者是父死子繼的世襲制，後者則是類似「兄終弟及」。兩個政權的政治繼承皆經過周詳的布局的與縝密的安排，尤其是牢牢地掌控「槍桿子」。不同的是，金正恩的接班缺乏長期的歷練，靠姑姑、姑丈與金正日安插的黨政軍勢力、國家機器的強力造神、壓制高階將領與革命元老，才能鞏固其權力。勞爾本身曾跟隨其兄參與革命戰爭，具有某些歷史造就的克里斯瑪，不像北韓那樣需要全力洗腦造神。勞爾長期參與國政，掌握軍權，內外鬥爭與執政的經驗豐富老練，金正恩則可能比較稚嫩。金正恩的優勢是年輕，若無意外或病故，仍可長期在位或掌權。卡斯楚兄弟的問題則是年事已高，子女對政治亦無興趣，不太可能形成世襲制。如果兩者先後故去，接班人是否能達成共識，順利組成集體領導的團隊，鞏固政權，穩定政局，或是各據山頭，猶未可知。不論是年輕人接班，還是老人政治，目前都只能從中英文新聞報導與研究論著推測其政治局勢，很難像中共政治菁英的研究那樣，以精密的、系統性的統計分析推斷其政治繼承、權力接班的模式與機制。

黨國體系方面，金日成建構的黨國體系係以黨領政，以黨領軍。金正日長期參與執政，正式接班後即透過修憲與權力布局，重組黨國體系，以「先軍政治」抬高軍方的地位，與行政體系表面上平起平坐，實際上地位更高。軍事體系的控制在黨組織係透過中央軍事委員會，在政府則是透過國防委員會。古巴黨國體系的演化則與北韓不同。古巴是先經過革命，推翻軍事政權，之後才成立古巴共產黨，共產黨再逐步掌控國家機器。黨組織與軍方之間的關係起初並非水乳交融，1970年代中期以後，卡斯楚兄弟為防範革命軍，另立國土民兵，制衡革命軍，並整肅可能威脅卡斯楚政權的高階將領。近年來在勞爾的統轄之下，軍方擁有自己的企業，也成為古巴經濟的主力，這點與北韓的「先軍政治」倒有幾分相似，只是黨軍關係的演化各有其獨特路徑與過程。

北韓與古巴的意識形態起初均標榜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再加上民族主義，但北韓的主體思想後來居上，成為鞏固統治者權力的意識形態，社會主義、馬列主義、共產主義的色彩逐漸淡化，成為一種裝飾。主體思想不只是一種思想統治的工具，更是（北）朝鮮的社會文化、地緣政治與派系鬥爭形塑而成的思想產物。革命後的古巴舉蘇維埃式社會主義與馬列主義，但面對美國的侵略意圖與圍堵，卡斯楚愈來愈傾向民族主義與反美的愛國主義，其意識形態背後更有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與大拉丁美洲思想的背景。卡斯楚政權自1990年代起逐步開放觀光旅遊產業等外資進入古巴，並小幅推動私有化，但似乎仍在市場改革與動員政治之間擺盪，並未直接往市場社會主義發展（如中國大陸），也不走新自由主義或震盪療法（如東歐後共國家）的路徑。北韓雖與南韓財閥合作，於2004年設立開城工業區，但多次宣布關閉園區（如天安艦事件），最近則是因為2013年的叫囂開戰而關閉。雖然北韓在金正恩初登位之時

有一些開放的經濟新聞，2013年年初叫囂之後又要求重開開城工業區，目前實在看不出北韓的經濟改革有什麼明確的意識形態原則與政策方向。

最後，北韓與古巴的國家機關仍緊密地掌控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係，尤以前者為甚。北韓在金氏家族的統治之下，完全摧毀傳統的階級結構，以黨國體系控制國家，國家機器完全吞噬社會。最近一次的集體動員，就是金正日的喪禮與出殯儀式。軍事性的集體動員，則是叫囂對南韓開戰。這種狀況要討論所謂的異議分子與市民社會，猶如天方夜譚。相對地，古巴雖曾為殖民地，獨立革命中卻曾產生雛型的市民社會。卡斯楚建立政權，雖能壓制市民社會，但在蘇聯倒台之後，市民社會曾有勃發的跡象，異議分子亦群起批判，只不過遭到卡斯楚的強力壓制。儘管如此，在後卡斯楚與勞爾時期，市民社會仍有可能逐漸找到生機，這種狀況在北韓似還無法想像。但值得注意的是，古巴的國家機器與人民之間並非簡單的二元對立，量化的實證資料分析顯示：由於強烈的反美情結、國族自尊心、較高的識字率與醫療技術水準（及醫療外交），卡斯楚兄弟的政權多少有其民意基礎與相當的支持度，也有鄰國的支持與奧援。

綜上所述，北韓與古巴都仍是極權主義體制與獨裁君主制，既未邁向後極權主義，也不能說是威權主義。對照表 1 與 Thompson 後極權主義的架構，北韓、古巴的市民社會自主性極低，北韓尤然。北韓、古巴均無政治社會與政黨政治可言，黨的合法性絕不容忍挑戰，不容許反對者或修正主義者的存在，領袖權威至上，社會也沒有全面的現代化。經濟社會在古巴有一點零星的市場改革跡象，在北韓則是幾乎沒有根苗。國家官僚的專業規範與自主在古巴極低，在北韓則是從屬於金氏政權與帝王制。憲政主義與法治在北韓與古巴更是付諸闕如，完全是父子或兄弟在操控。北韓、古巴也沒有照著 Thompson 的後極權主義路徑走，仍然停留在極權主義與獨裁君主制，後者勉強還算是初期的後極權主義，但只要勞爾在位有效統治一天，變化的可能性就不高。金正恩肅清攝政團隊，大權在握，未來動向更難預言。這兩個國家的獨裁君主制在短、中期內發生大規模政治轉型的可能性極低，「蘇東波」與「第三波民主」對這兩國的極權統治幾乎毫無影響（除了經濟與技術奧援短缺之外），「茉莉花革命」與「顏色革命」之類的戲劇性轉變，恐難發生。

事實上，即使是所謂的「茉莉花革命」與「顏色革命」，也極少有實質的、徹底的民主化與民主轉型，許多東歐、前蘇聯後共國家與經歷「阿拉伯之春」的國家，仍陷於政爭與混亂之中。「第三波民主」與民主轉型論的決定論式思維，難以描述、解釋，甚至預測北韓與古巴未來的政治轉變或轉型。從本文第二節的民主轉型理論、非民主國家或政權的類型學（包括極權主義、後極權主義、威權主義、蘇丹主義等）來看，北韓、古巴的政治社會、經濟社會與市民社會均缺乏自主性或幾乎不存在，統治者與政治菁英仍透過國家機器，掌握意識形態的主導權與軍力，還能夠進行大規模的集體動員（尤其是北韓）。在政體的類型與光譜上，北韓與古巴還是偏向極權主義，而且是家族式的極權主義，前者比後者更接近君主或帝王式的統治。透過本文檢視的四個面向，這兩個國家的極權統治能夠維持的主要原因在於統治者嚴密控制政治菁英的培養與領導階層的組合，將黨國體系與軍政大權集中在極少數人或家庭成員的手

上，以免大權旁落或尾大不掉。統治者也透過意識形態的論述與重建，維持統治者的合法性，搭配黨國體系的鎮壓力量，進行集體動員，壓制市民社會，徹底削弱社會對統治者與黨國體系的挑戰或抵抗。這四種原因，可以反襯出前蘇聯與東歐等前共黨國家，以及北非、中亞等非民主國家極權、獨裁政權倒台或崩潰的主要因素，有助於後續的個案分析與比較研究。

*

*

*

(收件：102年7月18日，接受：103年2月26日)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egime Characteristics and Political Transition of North Korea and Cuba

Chia-Huang W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Social and Policy Sciences

Yuan Ze University

Abstract

Why have North Korea and Cuba been able to resist pressure posed by democratization at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 Third Wave Democracy? What are the systemic and institut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orth Korean and Cuban ruling structures? How have the systems consolidated political power for the ruling families and the ruling class? The author explores the aforementioned questions via documentary analyses and interviews. The author highlight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non-democratic and hybrid regimes, examines the descriptive and explanatory power of typologies of totalitarianism and post-totalitarianism, and analyzes the reasoning of the “Color Revolution” and “Jasmine Revolution.”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the possibility of democratization in North Korea and Cuba.

Keywords: political transition, party-state, Juche Philosophy, Kim Jong-un, Castro

參考文獻

- 「金正恩的霹靂整肅」，*中國時報*，2013年12月11日，版A12。
- 尹德瀚，「古巴政府改組，勞爾大權鞏固」，*中國時報*，2009年3月5日，版A3。
- 王麗娟編譯，「管制近五十年，古巴解除旅遊禁令」，*聯合報*，2011年12月23日，版A18。
- 王麗娟，「張成澤被捕，北韓媒體宣揚」，*聯合報*，2013年12月10日，版A18。
- 白德華，「習近平促開六方會談，金正恩同意」，*中國時報*，2013年5月25日，版A16。
- 任中原，「穿軍裝亮相，張成澤權力在握」，*聯合報*，2011年12月26日，版A14。
- 安勇炫，「能相信的只有親人，金正恩姑母迅速崛起」，*朝鮮日報中文網*，轉引自*聯合報*，2011年12月23日，版A18。
- 余英時，「『君尊臣卑』下的君權與相權：『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餘論」，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市：聯經出版，1976年），頁47~75。
- 余英時，「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論儒、道、法三家政治思想的分野與匯流」，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市：聯經出版，1976年），頁1~46。
- 吳玉山，「顏色革命的許諾與局限」，*臺灣民主季刊*，第4卷第2期（2007年6月），頁67~112。
- 吳和懋，「金正恩『搗』蛋！一場非演不可大戲」，*商業周刊*，第1326期（2013年4月18日），頁46~47。
- 李京倫，「金正恩看迪士尼，跟上『世界潮流』」，*聯合報*，2012年7月21日，版A2。
- 李京倫，「傳北韓經改向北京學習」，*聯合報*，2012年7月21日，版A2。
- 李明，「金正日接班前景與北韓政局」，*亞洲研究*，第19期（1996年9月），頁60~79。
- 李基遠著，金中燮譯，「後冷戰時期北韓之總體問題：金正日之權力與軍方之關係」，*亞洲研究*，第19期（1996年9月），頁3~27。
- 李龍洙，「後金正日時代，北韓權力如何歸屬？」，*朝鮮日報中文網*，轉引自*聯合報*，2011年12月20日，版A2。
- 李鐔龍，2011，「古巴經改，開放私宅買賣」，*工商時報*，2011年4月20日，版A8。
- 金珉徹，「『尊敬的天降偉人』，金正恩偶像化加速」，*朝鮮日報中文網*，轉引自*聯合報*，2011年12月21日，版A6。
- 柯玉枝，「美國與古巴關係之限制與前景」，收入陳小雀主編，*拉丁美洲與世界關係*（臺北市：世理雜誌，2011年），頁105~127。
- 唐榮麗、陳文和，「姑丈攝政，推手還是對手？」，*中國時報*，2011年12月20日，版A2。
- 泰國世界日報，「古巴卡斯楚承認：共產主義已行不通」，*聯合報*，2010年9月13日，版A25。

- 張嘉浩，「北韓駁火奪次帥兵權，廿餘死」，*中國時報*，2012年7月21日，版A1。
- 張慧智、李敦球，*北韓：神秘的東方晨曦之國*（香港：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2008年）。
- 許菁芸、郭武平，「俄羅斯聯邦『競爭性威權』體制下之公民社會『管理』與民主走向」，*政治科學論叢*，第55期（2013年3月），頁33~84。
- 郭乃日，「務實政治將取代先軍政治」，*聯合報*，2012年7月21日，版A2。
- 郭崇倫，「古巴革命原地打轉」，*中國時報*，2011年4月26日，版A15。
- 陳世欽編譯，「卡斯楚時代幾年內落幕，古巴改革『總統任期限10年』」，*聯合報*，2011年4月18日，版A14。
- 陳韻涵，「為鞏固軍權，金正恩升70將官」，*聯合報*，2012年4月15日，版A18。
- 彭淮棟，「完全掌權，金正恩獲封北韓元帥」，*聯合晚報*，2012年7月18日，版A6。
- 彭淮棟、李京倫，「因病？失勢？北韓人民軍總參謀長被解職」，*聯合報*，2011年7月17日，版A14。
- 馮克芸、陳世昌，「老臣第二代，金正恩拉攏效忠」，*聯合報*，2011年12月23日，版A18。
- 楊明暉，「扶柩七將，新君的顧命大臣」，*中國時報*，2011年12月30日，版A19。
- 劉于甄，「金正恩『可以沒子彈』，上台先休兵」，*商業周刊*，第1269期（2012年3月19日），頁94~95。
- 劉德海，「北韓領導金正日過世後東北亞區域情勢展望」，*展望與探索*，第10卷第1期（2012年1月），頁17~22。
- 閻紀宇，「金正恩親信四人幫，掌情治機關」，*中國時報*，2011年12月28日，版A12。
- 聯合報編譯組，「金正恩升任國防委員長」，*聯合報*，2012年4月14日，版A4。
- 聯合報編譯組，「翅膀硬了，金正恩剷除姑丈人馬」，*聯合報*，2012年7月4日，版A14。
- “DPRK’s Socialist Constitution (Full Text),” <http://www1.korea-np.co.jp/pk/061st_issue/98091708.htm>.
- “Pyongyang Defense Command,” North Korea Leadership Watch, <<http://nkleadershipwatch.wordpress.com/dprk-security-apparatus/pyongyang-defense-command/>>.
- Agov, Avram, “North Korea: The Politics of Leadership Change,” *Harvard Asia Quarterly*, Vol. 15, No. 1 (March 2013), pp. 15~27.
- Ahn, Mun Suk, “Kim Jong-il’s Death and His Son’s Strategy for Seizing Power in North Kore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59, No. 4 (July-August 2012), pp. 27~37.
- Armstrong, Charles, “Beyond the DMZ: The Possibility of Civil Society in North Korea,” in Charles K. Armstrong, ed., *Korean Society: Civil Society, Democracy and the Stat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pp. 191~207.
- Azicri, Max, “The Castro-Chavez Alliance,”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36, No. 1

- (January 2009), pp. 99~110.
- Benjamin-Alvarado, Jonathan and Gregory A. Petrow, "Stability, Transition, and Regime Approval in Post-Fidel Cuba,"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7, No. 1 (Spring 2012), pp. 73~103.
- Byman, Daniel and Jennifer Lind, "Pyongyang's Survival Strategy: Tools of Authoritarian Control in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5, No. 1 (Summer 2010), pp. 44~74.
- Carothers, Thomas, "The End of the Transition Paradig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1 (January 2002), pp. 5~21.
- Diamond, Larry, "Thinking About Hybrid Regimes,"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2 (April 2002), pp. 21~35.
- Falcoff, Mark, *Cuba the Morning After: Confronting Castro's Legacy* (Washington, D. C.: The AEI Press, 2003).
- Fernández, Damián J., "The Good, the Bad, and the Ugly: The Normalization of Cuba's Civil Society in Post-Transition," in Marifeli Pérez-Stable. ed., *Looking Forward: Comparative Perspectives on Cuba's Transition* (Notre Dame,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pp. 96~118.
- Gause, Ken E., *North Korea under Kim Chong-il: Power, Politics, and Prospects for Change*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Praeger, 2011).
- Geddes, Barbara, "What Do We Know About Democratization After Twenty Year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 No. 1 (1999), pp. 115~144.
- Gonzalez, Edward and Kevin F., McCarthy, *Cuba after Castro: Legacies, Challenges, and Impediments* (Santa Monica: California: Rand Corporation, 2004).
- González, Jorge Luis Acanda, "Cuban Civil Society: I. Reinterpreting the Debate," *NACLA Report on the Americas*, Vol. 39, No. 4 (January 2006), pp. 32~36.
- Gordy, Katherine and Jee Sun E. Lee, "Rogue Specters: Cuba and North Korea at the Limits of US Hegemony," *Alternatives*, No. 34 (July-September 2009), pp. 229~248.
- Gutierrez-Boronat, Orlando, "The Cuban Civic Movement. Steps to Freedom,"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Vol. 18, Issue 1/2 (September 2006), pp. 157-170.
- Hadenius, Alex and Jan Teorell, "Pathways from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8, No. 1 (January 2007), pp. 143~156.
- Kirk, John M., "Cuban Medical Internationalism and Its Role in Cuban Foreign Policy," *Diplomacy & Statecraft*, Vol. 20, Issue 2 (June 2009), pp. 275~290.
- Kirk, John M., "Cuba's Medical Internationalism: Development and Rationale," *Bulletin of Latin American Research*, Vol. 28, Issue 4 (October 2009), pp. 497~511.
- Kronenberg, Clive W. "Manifestations of Humanism in Revolutionary Cuba," *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s*, Vol. 36, No. 2 (March 2009), pp. 66~80.

- Latell, Brian, "Raul Castro: Confronting Fidel's Legacy in Cuba,"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0, No. 3 (Summer 2007), pp. 53~65.
- Lee, Grace,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of Juche," *Stanford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Vol. 3, No. 1 (Spring 2003), pp. 105~112.
- Levitsky, Steven and Lucan A. Way, "The Rise of 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 13, No. 2 (April 2002), pp. 51~65.
- Linz, Juan J. and Alfred Stepan, *Problems of Democratic Transition and Consolidation: South Europe, South America, and Post-Communist Europe* (Baltimore, Maryland: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6).
- McEachern, Patrick, "Interest Groups in North Korean Politic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No. 8 (May-August 2008), pp. 235~258.
- Miroff, Nick, "The Cuban Model," *Global Post*, September 13, 2010, <<http://www.globalpost.com/dispatch/cuba/100913/cuba-socialism-castro-reforms>>.
- Mora, Frank O., "From Fidelismo to Raulismo: Civilian Control of the Military in Cuba," *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 Vol. 46, No. 2 (March-April 1999), pp. 25~38.
- Mujal-León, Eusebio, "Survival, Adaption and Uncertainty: The Case of Cub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5, No. 1 (Fall/Winter 2011), pp. 149~168.
- Oh, Kong Dan and Ralph C. Hassig, *North Kore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0).
- Otero, Gerardo and Janice O'Bryan, "Cuba in Transition? The Civil Sphere's Challenge to the Castro Regime," *Lat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44, No. 4 (Winter 2002), pp. 29~57.
- Pérez-Stable, Marifeli, "Caught in a Contradiction: Cuban Socialism between Mobilization and Normaliz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2, No. 1 (October 1999), pp. 63~82.
- Raby, Diana, "Why Cuba Still Matters," *Monthly Review: An Independent Socialist Magazine*, Vol. 60, No. 8 (January 2009), pp. 1~13.
- Rojas, Rafael, "The Content of Socialism in Cuba Today," *Internation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Vol. 12, No. 1 (March 2010), pp. 57~63.
- Steinberg, D. I., "On Patterns of Political Legitimacy in North Korea," in Samuel S. Kim, ed., *The North Korean System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p. 87~113.
- Thompson, M. R., "To Shoot or Not to Shoot: Posttotalitarianism in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 34, No. 1 (October 2001), pp. 63~83.
- Thompson, M. R., "Totalitarian and Post-Totalitarian Regimes in Transitions and Non-Transitions from Communism,"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Vol. 3, No. 1 (Summer 2002), pp. 79~106.
- Werlau, Maria C., "Cuba's Health-Care Diplomacy: The Business of Humanitarianism,"

World Affairs, Vol. 175, No. 6 (March/April 2013), pp. 57~67.

Wilkinson, Stephen, "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Cuban State," in Mauricino A. Font, ed., *Changing Cuba/Changing World* (New York: Bildner Center for Western Hemisphere Studies), pp. 11~21.